

布哈林案件

〔英〕肯·科茨著

25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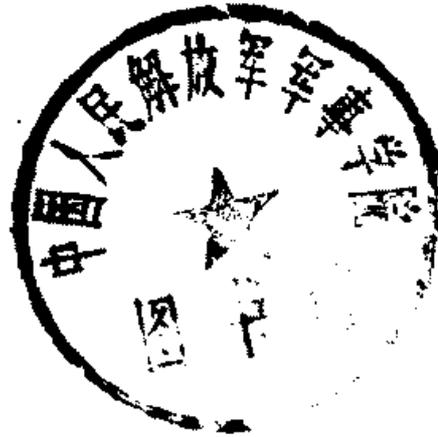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布哈林案件

[英]肯·科茨著

王德树译 王复加校



人民出版社

Ken Coates
THE CASE OF
NIKOLAI BUKHARIN

Spokesman 1978

根据英国“发言人”出版社1978年版译出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布哈林案件

〔英〕肯·科茨 著

王德树 译 王复加 校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 印张 78,000 字

1981 年 5 月第 1 版 198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3,000

书号 11001·455 定价 0.39 元

(只限国内发行)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GDA 94/25

献给安娜·拉林娜和

尤·尼·拉林

假若能完全象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六年以及后来多次提到的那样，在苏联“恢复社会主义法制”的话，那么写这本小册子就完全没有必要了。遗憾的是，实际上那是有必要来一个运动的，因此也就有必要写这本小册子，作为对这一运动的贡献。

这本小册子是我们怀着共同的心愿献给那个人的遗孀和儿子的，那个人受到了不仅仅是他自己同胞的极不公正的对待。

目 录

第一章	前言	1
第二章	来自莫斯科的呼吁	5
第三章	罗织的罪状	12
第四章	全世界都感到内疚	65
第五章	进一步理解布哈林	79
第六章	是布哈林宪法吗?	91
第七章	要求平反	96
	* * *	
附录一	老布尔什维克的呼吁书	101
附录二	保罗·斯普里亚诺的《布哈林案件》一文	103
附录三	答《共和国报》记者问	107
附录四	第一批签名的人	112
	* * *	
	后记(若列斯·麦德维杰夫)	116
	介绍几种参考读物	119

第一章

前 言

贝特朗·罗素和平基金会经常收到不少政治犯及其亲友的来信。但有些时候，基金会也很难帮助这些来信人做任何有益的事情，因为我们始终缺乏足够的人力和物力，而且有时感到很难为一项必要的研究筹到经费和组织适当的反应。为了略为克服某些力所不及的艰难局面，我们经常与其他一些专门组织进行合作。我们尽管有困难，但还是以某种方式受理了各大洲、两大主要国家集团以及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案件。

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是直接继承贝特朗·罗素本人为公民自由所主动承担的义务，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德莱福斯案件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素被拘留在布里克斯顿（同他拘留在一起的是马克辛·李维诺夫，他后来成了苏联第一任驻伦敦大使，后又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后来，罗素无疑是由于回忆起了他自己的这段经历，参加了几十次拯救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运动，其中包括从美国的萨柯和樊塞蒂案件到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的案件（拉科西在全世界的抗议声中仍被交给了苏联政府，而为匈牙利换来了一批老牌的傀儡人物）。到罗素建立起他的基金会时，他已接到了大量的邮

件，并且同时参加了保护二十多个国家的犯人。他使希腊的安巴蒂埃洛斯获得释放，使被劫持去的海因茨·勃兰特从东德监狱里释放出来，并使秘鲁开释了乌戈·布兰科。他参加了拯救一大批同波兰和苏联当局发生冲突的犹太人的运动。同时他还保护了遭到以色列政府歧视的阿拉伯人。所有这一切的情况都是极其复杂的，他经常甚至受到他帮助过的人的指责，说他前后自相矛盾。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真正自相矛盾的并不是他。

在他逝世以后，寄给他的信件还陆续不绝。我们甚至接到一些信，认为他还活着，并且仍在做着以卵击石的工作。我们经常为一些案件而苦恼，这些案件是他在我们之前已处理过的，但在新情况下又被重新提出来了。深深笼罩在巴基斯坦前总理布托头上的处决的威胁，^①使我们回想起他被阿尤布·汗监禁时大家所必然产生的焦虑。本·贝拉（罗素曾为他做了大量的求情工作）仍然在监禁中，^②使他获释的一切努力还没有成功。现在已进入一九七八年了，我们正在为乌戈·布兰科进行第三次请求；如今他已是秘鲁国会议员；但显然仍处在易受逮捕和放逐的境地。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联当局便越发不重视罗素的意见，而且还加强了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在罗马举行的拉丁美洲镇压事件罗素评议会期间，我们同巴维尔·李维诺夫（他刚刚被苏联驱逐出国）和伊利·佩利坎（他是由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出来的）进行了谈话，结果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一些大学方

① 布托已于1979年4月在拉瓦尔品第监狱被处死。——译者

② 本·贝拉已于1980年10月获释。——译者

面发出拯救这两个国家中一些特定犯人的呼吁，并得到了各国成千上万的人的支持。这样一来，我们就了解到一些从苏联来的信件，即使我们自己同苏联公民往来的某些信件被苏联当局扣压了。

但是，一九七八年春末，我们接到了一封性质不同的来信。这封信是从已被处决的苏联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的儿子那里寄来的。他请求重新审查他父亲的惨案，并在这封信（下一章还要介绍它）中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

正如我们将要证实的那样，布哈林案件至今仍是一个世人议论的话题。除非这个案件所引起的问题能在苏联国内开诚布公地让大家讨论，否则人们仍会议论不休。我们下面将尽力表明布哈林是无罪的，虽然我们完全知道这种观点已经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事实仍然是：苏联的执政党不顾大量确凿的证据，仍然否认这一点。拿罗素本人直接参与过的某些事情为例，我们就可以作出一个相应的类比。在被指控为替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的罗森堡案件中，如果可以确认所有政府指定的主要证人都在撒谎，他们提出的证据十分之九纯属捏造，那么我们又能指望美国政府做些什么呢？我们也只好认为罗森堡夫妇太冤枉了。但是，就布哈林案件来说，虽然为了达到官方的目的而已经提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可是这类证据同具有充分说服力和严谨性的证明是无法相比的，它只能说明布哈林同样受了冤枉，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冤枉还确实更厉害得多。布哈林的名誉所受到的污损，要比这两个被处决的美国人更为严重。在希斯案件中，如果惠特克·钱伯斯供认一切证据都是他个人编造的，那么反应

又会如何呢？布哈林案件的主要作证人都已去世了，因为他们都是在“招供”以后被处决的，但是苏联政府既为这些人恢复了身后的名誉，有时还给予他们荣典，那末它自己就证实了这些死者的案情是不真实的。

尽管有一些不幸的案件，但自从赫鲁晓夫先生讲了“恢复社会主义法制”以后，那种专断不公的程度在苏联显然大大减少了。不过，还有一些人天真地希望，社会主义总有一天会建成一个在各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公正的社会，他们会把苏联法院对这件事的拖延不决，看成是对大家的这种希望怀有强烈的和一贯的不满。

这个案件虽属旧事重提，却恰好关系到当代依然难以伸张正义的严重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桩冤案拖的时间越长，带来的痛苦也就越深。

第二章

来自莫斯科的呼吁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在莫斯科公开审讯了布哈林、李可夫等人。被指控的共有二十一人，而在起诉十一天后，竟将全体被告判为有罪。其中十八人被判处死刑，并于宣判两天后的三月十五日执行；一人被判处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其余两人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这一事件发生后四十年，全世界几乎没有人会承认他相信这次可悲的审判有什么公正之处可言。但是苏联当局仍然不肯对这一案件进行适当的甄别，致使一些主要的当事人，特别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和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李可夫，仍然蒙受着官方荒谬诽谤的耻辱。

在一次就镇压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的情况下，也许处决这些人是不太引人注目的。尽管在统计数字上对斯大林死刑名册的规模还有争论，但是毫无疑问，杀害苏联前总理和共产国际的一任首脑，毕竟在总的流血中添加了一点不易察觉的份量。¹但是从宪法的角度来看，这类司法谋杀的勾当对苏联社会的良心仍然是个沉重的负担，其原因将在下面论述。而且，只要这桩苏联历史上的可耻事件没有受到正视，哪怕斯大林时代的狂热症早已消退，苏联各族人民仍然不可能恢复自

已全部历史的本来面目，因而也不可能恢复充分的合理性。

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道：

“也许应该在莫斯科建造一座纪念碑，来永远纪念专横统治下受害的同志们。”

无论这座纪念碑是否建造，当时却有很多人希望今后保证对这件事进行实事求是的公开讨论。这一希望终于未能实现。自从一九六四年以来，官方一直明确地回避作这样的分析，因而国内出版的符合事实真象的苏联现代发展史，只能在地下出版物中传播；这些地下出版物经过辛勤的打印，再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

一九七七年六月以后，立即传开了这样一份文件：

“一九七七年六月初，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官员克利莫夫打电话到安娜·拉林娜（尼·伊·布哈林的遗孀）的公寓，要拉林娜同他进行联系。因为拉林娜不在莫斯科，布哈林的儿子尤·尼·拉林便于六月九日按照克利莫夫留下的号码给他回了一个电话，问他打电话来是否与布哈林的儿子和遗孀送去的信件有关。在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夕，他们向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主席团、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本人寄去一些信件，要求为布哈林恢复名誉。克利莫夫肯定他打那次电话是与这事有关，并讲了如下一段话：

“我奉命通知你，你们申请重新恢复布哈林在党内的地位和他
在苏联科学院的院士资格是不可能批准的，因为根据审讯他的罪

行而作的有罪判决尚未取消。’

尤·尼·拉林的回答是，很多布哈林的同案人都已恢复了名誉，并举了克列斯廷斯基、伊克拉莫夫和法·霍扎也夫为例。

克利莫夫答复说，拉林显然不知道还有绝大多数那次审讯的被告没有恢复名誉。于是拉林问道：‘你真的相信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杀害了高尔基吗？’克利莫夫答道：‘这个问题归法院和检察机关酌定。’拉林又问：‘这就是说，你认为我必须向这些机关申诉吗？’克利莫夫对此回答说：‘那是你的权利。’可是打开窗子说亮话，当前他不应当这样做。‘你应该知道现在情况有多么复杂。’

拉林娜和拉林在一九六一年就为恢复布哈林名誉的事提出了第一次申请。因此，这次驳回是在第一次申请十六年以后和最后一次申请一年半以后才下达的。(弗·伊·列宁的朋友叶·德·斯塔索娃和维·阿·卡尔宾斯基在一九六五年也提出了同样的请求，但到他们相继去世以后，一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接到了上述通知后，拉林立即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给苏联最高法院院长寄去了一份为布哈林恢复名誉的请求书。”²

对请求书作出如此迟钝的反应，不管能不能归因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部门渴望宽恕斯大林，而令人可悲的是，拉林和他的母亲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为布哈林再度伸张正义以来，他们的努力竟毫无结果。

这说明了拉林为什么觉得必须请求恩里科·贝林格给予帮助。在下面这封不寻常的信件中，再现了过去三十年代末期那种令人恐怖的气氛：

“尊敬的贝林格同志：

我是在我父亲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惨死四十周年纪念日前夕给您写这封信的。父亲死时我才两岁，自然回忆不起我父亲的情况。但是我母亲却在斯大林的监狱和集中营里度过了许多年，奇迹般地活下来了，并向我讲了我父亲的真实情况。后来，有一位列宁的挚友、在大恐怖中幸存下来的老布尔什维克——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他在某些方面知道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情况，向我谈起了他。此外，我还看了许多布尔什维克的书籍（这些书籍是在我国至今被查禁而在几位老布尔什维克手里侥幸保存下来的），其中包括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本人所写的书籍和外国研究者的著作。我靠这种办法得到的这些材料，有助于我充分了解我父亲的为人，以及他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我知道斯大林是罪大恶极的，知道他捏造党史至何等程度，也知道一九三七年二、三月中央全会对我父亲的指控和后来对所谓‘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的审讯都是十分荒谬和拙劣的。但是，我父亲就是在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从事间谍活动、叛国、搞破坏和谋杀）下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党和判处死刑的。

一九六一年初，我母亲拉林娜以及后来我本人，都坚持不懈地向我们党和国家最高机关提出撤销对布哈林的荒谬指控和恢复其党籍的问题。以前党中央书记叶·德·斯塔索娃为首的几位资历最老的老布尔什维克，也向党的领导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都早已去世而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只是到了去年（一九七七年）夏天，我们才从电话里得到了几句回话。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的一位官员用电话通知我们，由于那次审讯的文件尚未复查完毕，审讯中对布哈林的指控仍未撤销，所以恢复他党籍的问题还不能予以解决。这就是说，在处决我父亲四十年以后，我们总算得到了一个答复，而这个答复实际上仍然肯定了斯大林那些恶毒的指控。我向法院（苏联最高法院）提出的请求也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干脆就不给我答复。

在大部分居民都是用谎话连篇的《简明教程》教育出来的国家

里,有很多人仍然认为我父亲是个叛徒和希特勒的奴仆,尽管事实真相是:他是一位杰出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士,在他最后的岁月里,曾把全部精力用于揭露法西斯主义,向世人警告不断增长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

我父亲最后一次离家去参加一九三七年二、三月中央全会的时候(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对我母亲说:‘你用不着难过,历史上有的是惨痛的错误。我希望我的儿子能成长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他把这次已经发生的事件早就看成是一出转眼即逝的悲剧,因为他相信社会主义的力量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不是一名党员,但对我父亲来说,‘布尔什维克’这个词的含义,毫无疑问地就是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的战士。然而在我们的国家里,我们却无法为那个列宁在逝世前称之为‘全党所喜欢的人物’的人去伸张正义。我的母亲从斯大林集中营的恐怖中活了下来,她知道列宁的许多战友,了解老布尔什维克党的许多代表人物——这些人在她的回忆中给她留下了一些最愉快的往事,而她也总是满怀亲切和爱戴之情谈到他们。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对我母亲来说,简直是越来越不堪忍受。要我们这些仍然肩负着斯大林罪行的重担而无法把它抛到历史垃圾堆里去的人,能够去为崇高的理想奋斗,这是一件不能设想的事情。

贝林格同志,我向您求助,不仅因为您是西欧最大共产党的领导人,并已摆脱了斯大林罪行的重担,而且还因为尼·伊·布哈林是一位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者,一位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积极成员。很多国家的共产党人都认识他,并且经常热情地缅怀他。他们当中有些人还健在,还在意大利共产党队伍里工作着。我尤其记得翁伯尔托·特拉奇尼同志^①。

我向您求助,请您参加为我父亲恢复名誉的运动,只消用您觉

^① 翁伯尔托·特拉奇尼生于1895年,是意大利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他曾参加建立意大利共产党(1921年)的工作。——译者

得最适合于您的方式就行。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临死前不久还写了一封‘致未来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信，吁请他们替他‘平反昭雪’。我母亲在黑暗的年代里熟记了这封信的全文，并在她本人恢复名誉以后，将这封信交给了党中央委员会。这封信的结束语是：

‘同志们，要知道，在你们举着向共产主义胜利迈进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

忠实于您的尤·拉林(布哈林)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二日”

罗素和平基金会得到这个信息，就将它发散到许多国家去征求签名，而获得了十分广泛的响应。在我们对这桩公案作出结论之前，还要进行更充分的讨论。不过，苏联当局既然坚持认为布哈林的无罪尚未能确立，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审查一下他定罪的证据究竟是怎么回事。

注 释

- 1 据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论述：“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斯大林在政治恐怖方面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纪录。科尔内利·苏拉实行的‘公敌宣告’曾处死数千名罗马人。在提庇留、卡利古拉和尼禄这三个罗马暴君统治期间，又有几万罗马人被消灭。据说最残酷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所长托马斯·托尔奎马达曾活活烧死一万零二百二十人，并烧掉六千八百六十具逃亡的或已死去的异教徒的模拟象，此外还判处九万七千三百二十一人终身监禁、没收财产和穿一种名叫‘圣宾尼陀’的耻辱服。伊凡雷帝的沙皇特辖区制度使几十万人丧命，在这一制度最猖獗的时期，莫斯科每天有十至二十人被处死。在雅各宾恐怖时期，根据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的统计，由革

命法庭判决而上断头台的共一万七千人。大约还有同样数量的人未经法庭审讯即被定罪或屈死狱中。至于因‘嫌疑’而被雅各宾派关到监狱中的人数就不知有多少了；最可靠的估计为七万人。在十九世纪的俄国，由于政治原因被判死刑的只有几十人，而死在监狱里和流放地的‘政治犯’才几百人或最多几千人。

而斯大林恐怖的规模之大，是无法比拟的。根据最谨慎的估计，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因政治原因而受迫害的有四、五百万人，其中至少有四、五十万人（首先是负责干部）被即时枪决了，其余的被处长期监禁。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有不少日子里，仅在莫斯科一地，一天就有上千的人被枪毙。这已不是鲜血流成的小溪，而是鲜血汇成的大河；这都是诚实的苏联人民的鲜血。我们必须说一句坦率的真话：往昔的任何暴君和昏王，都没有镇压和消灭过如此众多的自己的同胞。”（《让历史来审判》，英文版，第239页）

- 2 这份文件发表在美国社会主义报纸《现代周刊》，1977年11月16—22日，第13页。

第三章

罗织的罪状

在尼·伊·布哈林等人的案件中提出的公诉书，是一份令人毛骨悚然的文件，而整个案情经常在有关苏联问题的西方著作中予以探讨*。但是，这些探讨都倾向于特别注意审讯过程中曾经发生的争辩，并普遍认为绝大部分具体的指控显然是捏造的。既然这是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目前拒绝受理的一个问题，那就有必要把探讨集中在原来的公诉书上，以便揭示出公诉书是与后来苏联政府官员们自己变化多端的言行完全抵触的。为此，我们将在公诉书篇幅中有关的地方加上注语；为了便于阅读，注语用另一种字体排印。还要附带说明一下，这些注语中的反驳理由肯定是不够充分的，因为它们实际上是由一位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的人编辑的，他既没有接触过这桩案件的许多材料，又是在远离苏联而对苏联当前的政治只有一般了解的情况下工作的。如果公诉书连如此不熟

* 在容易得到的著作中，值得提到的有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伦敦企鹅出版社，1971年版；A·B·乌拉姆：《斯大林》，艾伦·莱恩，1973年版；斯蒂芬·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怀德伍德出版社，1974年版；格奥尔基·卡特科夫：《审讯布哈林》，巴茨福特，1969年版。这些都是指引门径的书籍，读后即可进一步钻研大量复杂的文献。

练的考核都经受不住的话，那么这本身就实际上证明了公诉书的荒谬性。

公 诉 书

本案被告尼·伊·布哈林、阿·伊·李可夫、亨·格·雅戈达、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克·格·拉柯夫斯基、阿·巴·罗森戈尔茨、弗·伊·伊凡诺夫、米·亚·切尔诺夫、格·费·格林科、伊·阿·捷连斯基、谢·亚·贝索诺夫、阿·伊克拉莫夫、法·霍扎也夫、瓦·佛·沙兰戈维奇、普·基·朱巴列夫、巴·彼·布拉诺夫、列·格·列文、德·德·普列特涅夫、伊·尼·卡扎可夫、维·阿·马克西莫夫-季科夫斯基、彼·彼·克留奇可夫*被控为遵循敌视苏联的外国谍报机关的指示，组织了一个被称为“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的阴谋集团，旨在充当外国间谍，从事破坏、捣乱和恐怖活动，暗中破坏苏联的军事力量，煽动各敌国进攻苏联，便于它们瓜分

* 起诉书开列的这些人中，据说下列人员已彻底“恢复了名誉”：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弗·伊·伊凡诺夫、米·亚·切尔诺夫、格·费·格林科、伊·阿·捷连斯基、阿·伊克拉莫夫、法·霍扎也夫和彼·彼·克留奇可夫。（参看罗伊·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发言人”出版社，1976年版；《布哈林的最后两

苏联，使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细亚各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远东滨海区脱离苏联，最后达到推翻苏联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的目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机关经调查后，确认本案被告遵循敌视苏联的外国谍报机关的指示，组织了一个“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的阴谋集团，其目的在于推翻苏联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便于各敌国瓜分苏联，使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细亚各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滨海区脱离苏联。

调查认定，“右派-托洛茨基联盟”内部纠合有托派、右派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以及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中亚细亚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此事不仅已由目前的调查材料证实，而且也由来自苏联各地的审讯材料，特别是对图哈切夫斯

年》，载《新左派评论》，第109期；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伦敦企鹅出版社，第690页。）下面将要提到的雅基尔将军的儿子彼得·雅基尔，在他自费印行的信《斯大林——一次刑事审理的借口》中说，布哈林审讯中的二十二名（原文如此）被告有十七人恢复了名誉，但是他跟麦德维杰夫一样，没有注明日期或出处（参见《考察》，1969年，第70—71期，第266页。）

基*等人的军事阴谋集团(他们已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由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为有罪)和对穆迪瓦、渥库扎瓦等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他们已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九日由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法院判为有罪)的

*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

“在二十大谴责个人迷信之后,反党集团就竭力阻止进一步的揭发。莫洛托夫说,凡是大的案件,总是办得不好和办得好的地方兼而有之的。他企图替个人迷信时期所办的那些错案作辩解,并且扬言这类错案现在还有可能发生,将来也可能重演。这就是反党派别集团的办案路线。这次不是出于一种错误的见解,而是出于一种无视法纪的冒险主义立场。他们要把党和国家从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推开,而企图回到个人迷信时期的政策和领导方法上去。

但是他们估计错了。中央委员会、我们全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给了反党集团以坚决的打击,揭穿了并粉碎了派别活动分子。

我们在这里一回想起那许多无辜死去的卓越的党领导人和优秀的政治家,就不禁要痛心疾首。

遭到镇压的有下列杰出的军事首长: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乌鲍列维奇、科尔克、叶戈罗夫和埃德曼等人。他们是我们军队里劳苦功高的人物,尤其是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和乌鲍列维奇。他们都是卓越的统帅。后来,勃柳赫尔(在中国以加伦将军而闻名——译者)和其他著名的军事首长也牺牲了。

曾经在外国报刊上透露过这样一条十分古怪的消息:说什么希特勒在准备进攻我国时,通过他的谍报机关炮制了一

审讯材料所证实。

“右派-托洛茨基联盟”在其反对苏联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夺取权力的斗争中，由于完全缺乏国内的支持，只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外国侵略者的武装援助上，而外

份伪造的文件，其中声称雅基尔和图哈切夫斯基等同志是德国总参谋部的间谍。这份所谓机密‘文件’落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的手中，看来他是出自良好的愿望把文件转交给了斯大林。因此雅基尔和图哈切夫斯基等同志被捕，然后就被处决了。

红军中许多出色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也遭到处决。在座的代表中就有一些同志（我不愿说出他们的名字，免得引起他们的伤心），他们坐了许多年的监牢。曾经有人一个劲地‘劝导’他们，要他们供认自己是德国间谍，或者英国的或其他国家的间谍。于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就‘招认’了。甚至对这些人宣布撤销其间谍罪名的时候，他们还自愿坚持他们先前的口供，因为他们认为，宁可一口咬定自己原来的假口供，好快点死去，免得再受严刑拷打。

个人迷信的道理就在于此！莫洛托夫等人妄图恢复个人迷信时期的恶劣作风而采取的那些行动，也就是出于这个道理。由于这个道理，反党集团才想使党走回头路，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他们的斗争竟如此艰难困苦的真正原因所在。每一个人都已经了解，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我和雅基尔同志很熟。我也认识图哈切夫斯基，只是不如跟雅基尔那么熟识罢了。今年在阿拉木图开会时，他那个在哈萨克斯坦工作的儿子来找过我。他向我问起他父亲的事。我能告诉他什么呢？

当我们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审查这桩案件的时候，我们

国侵略者则同意援助这些阴谋者，其条件是要瓜分苏联，使乌克兰、滨海区、白俄罗斯、中亚细亚各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脱离苏联。

这一阴谋的许多主要参加者老早就外国谍报机关的间

接到报告说，不论是图哈切夫斯基和雅基尔，还是乌鲍列维奇，都没有对党和国家犯过任何罪行。所以我们就问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你们赞成恢复他们的名誉吗？’

他们回答说：‘是的，我们赞成。’

‘可是这些人是你们亲手处死的。’我们气愤地说，‘你们什么时候是按良心办事的？是当时，还是现在？’

他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也不愿回答。你们已经听到过他们在给斯大林的那些信里是怎样写的。那末，人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谢列平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已经告诉了你们，红军中的这些共产党的优秀代表是怎样被杀害的。他引述了雅基尔同志给斯大林的一封信，并宣读了这封信上的批语。应当说，雅基尔有一个时期是很受斯大林器重的。

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在临刑时，雅基尔还高喊：‘共产党万岁！斯大林万岁！’

他是这样相信党，相信斯大林，以至于不可能相信，对他采取的非法行为是蓄意发生的。他只相信，一定是有敌人钻进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里了。

当有人把雅基尔临死前的表现告诉斯大林的时候，斯大林还把雅基尔痛骂了一顿。”（引自《答苏共纲领报告讨论会》，1961年10月18日，《苏联新闻》丛刊，第81期，第113—114页。）

谍，并为这些谍报机关进行了多年间谍活动，因此在“右派-托洛茨基联盟”与各敌国代表之间达成协议时一拍即合。

这些败类中首屈一指的是这一阴谋的唆使者之一，人民公敌托洛茨基。关于他与盖世太保的联系，早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审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和一九三七年一月审讯反苏托派中心时，就已找到充分证据。*

但是，本案调查当局所获得的材料则更足以判明，人民公敌托洛茨基老早就与德国政治警察以及其他国家谍报机关建立了联系。调查结果判明，托洛茨基是从一九二一年起就与德国谍报机关勾结，而从一九二六年起又与英国谍报机关挂上钩的。

至于本案被告，其中很多人，根据他们本人的供词，都是长期以来就在替外国谍报机关充当间谍了。**

例如，被告尼·尼·克列斯廷斯基便直接遵循人民公敌托洛茨基的指示，于一九二一年参与了投靠德国谍报机关的

* 西方各界知名人士，包括H·G·威尔斯在内，曾请求战后在纽伦堡审讯过纳粹战犯的检察当局出面证实这些“证据”，却没有得到后者的理会。在盟国缴获纳粹的所有大量档案中，也从未发现这样的“证据”。

** 但是，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却已恢复了名誉。伊·米·迈斯基曾在《消息报》(1963年9月27日)上热情地写到他。并且在《历史百科辞典》中，他也受到赞扬(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181页)。

叛国活动。

被告阿·巴·罗森戈尔茨是托派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于一九二三年开始为德国总参谋部从事间谍工作，又于一九二六年开始为英国谍报机关工作。

被告克·格·拉柯夫斯基是托洛茨基的亲信之一，从一九二四年起充当英国谍报机关的间谍，又从一九二四年起充当日本谍报机关的间谍。

被告米·亚·切尔诺夫于一九二八年开始为德国做间谍工作，当时是在臭名远扬的流亡者孟什维克唐恩的鼓励和帮助下与德国谍报机关建立联系的。*

被告瓦·佛·沙兰戈维奇于一九二一年加入波兰谍报机关，并被派往苏联从事间谍工作。**

被告格·费·格林科于一九三一年成为德国和波兰谍报机关的间谍。***

“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的领导人，其中包括本案被告李可夫、布哈林等人，已被充分证实与其同伙之间有间谍联系，并竭力促进这类间谍联系的扩大。

所有这一切足以说明，这些为外国谍报机关工作的先生们为什么竟欣然同意让外国瓜分苏联，使各地区和各共和国统统脱离苏联。

* 切尔诺夫也恢复了名誉。

** 以类似的罪名而没有经过审讯便遭处决的所有波兰共产党员，都恢复了名誉。

*** 格林科已恢复了名誉。

作为本案被告的几个阴谋犯曾经充当过沙皇秘密警察的暗探和特务，因而也有利于“右派-托洛茨基联盟”和外国谍报机关之间很快达成协议。

这些奸细虽然窃踞了苏维埃国家的负责职位，但是却唯恐暴露他们反对过工人阶级、反对过社会主义事业的罪行。这一阴谋的参加者们由于经常害怕暴露自己，便将其安全的唯一希望寄托在推翻苏维埃政权、消灭苏维埃制度和复辟地主资本家的政权上，就象他们曾经为了地主资本家的利益而把自己出卖给沙皇秘密警察那样，觉得只有在地主资本家统治下才有自身的安全感。

例如，被告伊·阿·捷连斯基*自一九一一年以来曾充当萨马拉宪兵司令部的特务。从那时起，捷连斯基用假名“奥奇卡斯蒂”和“萨拉夫”，有计划地向宪兵司令部报告有关萨马拉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活动情况，为此他按月领取规定的赏金。

被告伊凡诺夫于一九一一年开始其暗探活动，当时即由土拉省秘密警察将其列入编制，成了化名为“萨马林”的一名秘密警察的密探。**

被告朱巴列夫于一九〇八年加入沙皇警察，并以假名“瓦西里”、“帕林”和“普罗克霍尔”从事活动。

调查结果表明，这些阴谋者为了达到他们颠覆苏维埃政府、夺取政权，并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曾经直接

* 捷连斯基已恢复了名誉。(参见《让历史来审判》，第181页。)

** 伊凡诺夫已恢复了名誉。(参见《让历史来审判》。)

遵循外国谍报机关的指示,为它们进行了广泛的间谍活动,组织和进行了各种破坏和捣乱,以便在法西斯侵略者一旦进攻苏联时击败苏联,并竭力煽动法西斯侵略者早日发动进攻,同时还对苏联的党政领导人和著名人士策划和采取了一系列恐怖行动。

一、反苏维埃国家的间谍活动 和对祖国的叛逆行为

调查结果表明,本案被告“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的大多数领导人曾直接遵循托洛茨基的指示,并按照某些外国总参谋部的广泛策划和精心布置的计划,进行其各种罪恶活动。

德国谍报机关的间谍、著名的托派分子、被告克列斯廷斯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日在苏联检察署受审时供称:

“我同德国人建立间谍联系是直接遵循托洛茨基的指示行事的,他指示我与泽克特将军着手商讨此事……”*

(第3卷,第102页)

* 克列斯廷斯基(他在后来的审讯中一直翻供,直到他被压服为止)不仅恢复了名誉,而且他的工作还在苏联报刊上受到热情的评价。但是,正如康奎斯特所写的那样:“给克列斯廷斯基恢复名誉而不给罗森戈尔夫茨恢复名誉,就等于给布尔克恢复名誉而把黑尔留在被告席上。”(十九世纪初,两人合谋杀人卖尸给爱丁堡一解剖学家,屡获暴利。后布尔克被判绞刑,黑尔因有皇家注册证书得免于死。——译者)

关于托派组织和德国谍报机关建立联系时的情况，据被告克列斯廷斯基供称：一九二一年冬天，他与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泽克特进行谈判，企图从德国国防军那里获得经费来进行托派的地下工作，其交换条件是由托派分子向德国谍报机关提供秘密情报。

关于此事，被告克列斯廷斯基供认如下：

“……托洛茨基指示我到达柏林后即与泽克特将军商谈此事。我执行了托洛茨基的这一指示。……”

(第3卷,第14页背面)

关于他本人及其同伙的叛逆活动，被告克列斯廷斯基供认如下：

“我们与泽克特和哈斯两将军商定，要帮助德国国防军在苏联境内建立若干间谍基地，保证德国国防军所派间谍能顺利潜入，并向他们提供情报，等等；说得坦率一点，就是要为德国充当间谍。为此，德国国防军保证每年付给我们二十五万马克，作为反革命托派工作的津贴。……”

(第3卷,第102页)

“此项津贴，一年分为数次，大都在莫斯科，有时则在柏林，按时付给。……”

“如果因故不能在莫斯科付给，即由我在柏林亲手向泽克特领取，并照例由我亲自带往莫斯科交给托洛茨基。”

(第3卷,第15页)

另一个著名的托洛茨基分子，托派反苏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和这次阴谋的积极参加者罗森戈尔茨，被指控为从事间谍活动，在调查过程中，确证托洛茨基曾与德国国防军达成一项协议，并供认如下：

“我是从一九二三年开始间谍活动的，那时，我遵循托洛茨基的指示，将各种秘密情报交给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泽克特和德军总参谋长哈斯。后来，某国驻苏联大使N先生与我建立了直接联系，由我按期供给他一种谍报性质的情报。N先生离去后，我又继续与该国新任大使N先生保持间谍联系。”

(第4卷,第131页背面)

在德国法西斯政变后，托洛茨基分子的间谍活动范围更为广泛，并明显地表现出失败主义的特征。

被告贝索诺夫在其自供中声称，他曾积极参加过托洛茨基分子和德国法西斯集团(主要是军界人士)之间关于联合反苏问题的秘密谈判。他不仅亲自与罗森堡在法西斯党外事部中最亲密的同伴得茨商讨过支援这一反苏阴谋的事，而且对托洛茨基与哈斯、尼德梅耶、豪斯贺费尔教授的多次会谈，以及托洛茨基和他们之间达成若干条款的协议，他都很清楚。这个情况，在审讯反苏托派中心时，已由皮达可夫交代了。

被告贝索诺夫*供认：

* 麦德维杰夫报导说：

“正如这些条款可以证明的那样……托派的地下工作是以在苏联进行破坏、谍报、捣乱和恐怖行动为其重点的。”

(第11卷,第106页)

在调查期间,本案其他被告也承认,托洛茨基和苏联托派组织为一方、同法西斯集团另一方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并遵循德国谍报机关的指示,在苏联进行破坏性的失败主义活动。

但是,托派走狗的失败主义活动并不仅仅限于同德国法西斯相勾结,他们还与其他参加反苏阴谋的人合作。遵循托洛茨基的路线,他们还投靠另一个法西斯侵略者——日本。

反苏阴谋者向日本谍报机关卖身投靠的具体情况,见于下述各项调查材料。

正如被告克列斯廷斯基所供认的那样,他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在梅拉诺与托洛茨基会晤时,托洛茨基极力主张必须与

“在组织审讯和落实‘情节’方面,贝索诺夫的作用特别重要。因为按照设计,正好应该就是他勾通了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与‘右’派(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之间的联系;他在苏联驻柏林贸易代表团工作期间,想来也该安排了反对派与托洛茨基及其儿子谢多夫之间的多次会晤,并向他们传递各项指示,等等。但是,对贝索诺夫在审讯中所起的这种作用势必很难加以谴责,因为那是他备受折磨才迫不得已承认下来的。他遭受了最高明的拷打,毕竟忍受住了十七天不让睡觉的‘轮番作战’,而其他很多人都没有坚持到四、五天以上。对他的拷打一直没有间断过。但是,正如很多其他案件一样,经过长时间的初期反抗之后,他终于垮下来了,并在伪造的声明上画了押。贝索诺夫再也没有力量进行进一步的反抗,而成了审讯组织者手里的驯服工具。”(《布哈林的最后两年》,载《新左派评论》,1978年,第109期)

日本谍报机关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克列斯廷斯基将托洛茨基的指示传达给皮达可夫和这一阴谋的其他领导人，要他们通过被告拉柯夫斯基等阴谋参加者的中介，与日本代表进行贩卖性的联系，由日本负责向阴谋者提供武装支援；其交换条件是，阴谋者同意把苏联滨海区交给日本。

正如调查结果表明，被告拉柯夫斯基为了一九三四年夏天去日本，曾从皮达可夫那里接到指示，其大意是：

“……为了同敌视苏联的各国政府取得联系，必须同时增强在国外的活动。……必须尽可能利用好访问东京的这次机会，或许……将要在这方面采取一些必要的步骤。”

（第4卷，第194页）

被告拉柯夫斯基执行了这一指示，并在东京期间的确与某国的一些集团建立了违法的联系。

有关此事，被告拉柯夫斯基供认如下：

“所有这些情况必然导致一个实际的后果，那就是我……在东京时直接成了某国的间谍，并遵照该国的指示，被日本大财阀N先生这位资本主义和封建日本最有影响的政界人物所征募。”

（第4卷，第186页）

上述被告拉柯夫斯基在说到人民公敌托洛茨基与英国谍报机关的勾结时，证实如下：

“我知道托洛茨基从一九二六年底起，就充当英国谍报机关的间谍。这是托洛茨基亲自告诉我的。”

(第4卷,第363页)

属于“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也与外国谍报机关有极其密切的联系。*

例如，被告格林科是德国和波兰谍报机关的间谍，与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法西斯组织的反苏活动有关，并且是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他供认如下：

“……一九三〇年，在我们组织内部，曾讨论过有必要与波兰达成协议，以取得其军事援助，在乌克兰发动一次反对苏维埃政府的起义。与波兰谈判的结果，达成了一项协议，由波兰总参谋部增加军火的供应以及派往乌克兰的捣乱分子和彼得留拉分子的人数。”

(第9卷,第18页)

他进一步供称：

“一九三二年底，我因从事民族主义活动，与N先生建立了叛国性质的联系。我们经常在我的办公室里碰头，N先生也总是到我办公室来找我，商谈关于德国让步的问题。”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N先生坦然地告诉我，德国法西斯分子

* 以上这些供词既无碍于为克列斯廷斯基平反昭雪，因而紧接着也为格林科恢复了名誉。(参见《让历史来审判》，第181页。)

希望在乌克兰问题上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合作。我欣然向 N 先生表示同意合作。此后，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期间，我会晤 N 先生多次，并在他离开苏联前夕，把我介绍给另一位 N 先生，我同他继续保持叛国性质的联系。”

(第 9 卷, 第 286 页背面)

反苏阴谋的另一个参加者、乌兹别克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被告伊克拉莫夫*供认如下：

“在我们面前经常摆着一个倒向某个欧洲强国的问题，希望这个强国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爆发时，给我们直接的援助。”

(第 12 卷, 第 59—60 页)

“……这一反革命组织的某些成员认为，英国是最可能帮助我们的国家，因为它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够在直接的武装斗争中给我们充分有效的援助。……”

(第 12 卷, 第 60 页)

被告沙兰戈维奇是波兰谍报机关的间谍，白俄罗斯民族主义法西斯反苏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据他供认，该组织不仅

* 既为伊克拉莫夫恢复名誉，就应当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供词”反映了斯大林对外政策中某种当代的手法。这是托洛茨基曾经指出过的。(见托洛茨基：《1937—1938 年文稿》，第 236 页以及以后各页)

遵循右派以及“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的指示，而且遵循波兰谍报机关的指示，从事破坏活动。*

关于此事，被告沙兰戈维奇供认如下：

“到这时(一九三三年)所有右派、托洛茨基分子和民族主义法西斯分子之间的分歧已完全消除了。我们确立了共同的任务，即以各种可能的方法，包括恐怖主义、捣乱和破坏，来反对苏维埃政府。在民族共和国境内从事活动的这三个组织的最终目的，是使白俄罗斯脱离苏联，建立一个‘独立的’缓冲国，它毫无疑问地将完全控制在波兰和德国手中。……”

(第14卷,第27页)

他进一步供称：

“无论我们接到的指示是来自莫斯科，即来自右派和托派的中枢，还是来自华沙，即来自波兰某些集团，都是没有区别的，它们都完全一样，我们也一律照办。”

(第14卷,第31页)

被告李可夫完全承认右派与法西斯波兰有叛国性质的勾结，他供认如下：

“……右派组织中的一批成员按照右派中心和我本人的指示，

* 沙兰戈维奇曾供称，白俄罗斯共产党人戈洛杰德和切尔维亚科夫是波兰间谍。但是，他们都完全恢复了名誉。(参见《让历史来审判》，第180页)

为了实现我们阴谋的叛国计划，与法西斯波兰，尤其是与波兰谍报机关，建立了联系。”

(第1卷,第118页)

被告李可夫在进一步讲到使白俄罗斯脱离苏联的计划时,供认如下:

“我们当时一致同意的一般原则是：在与波兰人谈判时，……我们应同意使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脱离苏联，并建立一个‘独立的’白俄罗斯，作为波兰的保护国。……”

(第1卷,第119页)

根据调查结果，“右派-托洛茨基联盟”中的右派反苏集团的全部犯罪活动证明，右派和这一阴谋的其他参加者均系外国总参谋部的间谍。

右派中有些人是直接地，有些人则是通过他们同伙的介绍，也与一些外国谍报机关有联系。他们在从事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斗争中，只有依靠这些外国谍报机关的援助。

被告布哈林对托洛茨基和德国法西斯之间进行的那些谈判是知情的，并象托洛茨基一样，也准备使苏联失败，并使乌克兰、白俄罗斯、滨海区、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中亚各共和国脱离苏联。

对上述情节，被告布哈林已完全承认，他供认如下：

“当托洛茨基与德国法西斯谈判并允许割让领土给他们时，我们右派已与托派建立了联盟。拉狄克告诉我，托洛茨基认为，联盟

有没有取得权力的机会，主要取决于苏联在对德国和日本作战中是否会失败，而且他建议在苏联战败后，将乌克兰让给德国，将远东割与日本。拉狄克是在一九三四年告诉我此事的。……”

(第5卷,第107页)

关于此事,被告霍扎也夫在调查过程中供认如下:

“布哈林极力主张,乌兹别克和土库曼应脱离苏联,成为日本和德国的保护国。但对英国也不能有所怠慢,因此必须与英国人建立联系。最可行的办法是建立一个英国保护国,这就是要把着重点放在英国上的原因。”

(第13卷,第89—89页背面)

调查中掌握的其他材料也充分证实了被告霍扎也夫的证词,并彻底揭露了“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的失败主义路线。*

因此,被告李可夫对此供认如下:

“至于我们的失败主义立场,布哈林是完全同意的,并且表现得比我们更感兴趣得多。特别是,战争一旦爆发便对德国人打开防线的想法,就是他倡议和设计出来的。”

(第1卷,第152页)

被告李可夫在谈到他本人对此问题的态度时,供认如下:

“我跟右派中心的其他成员一样,知道我们反革命组织的代表

* 但霍扎也夫已彻底恢复了名誉。

与德国法西斯的代表之间正在进行一些叛国性的谈判，以寻求他们的援助。当然，他们援助的大小取决于我们对德国法西斯让步的程度，对这一点我们是一致同意的。”

（第1卷，第151页背面）

这就是这帮叛徒结成的“右派-托洛茨基联盟”从事间谍和失败主义活动的具体情况，他们把苏维埃国家的机密出卖给外国谍报机关，用苏联人民的自由、用社会主义工农国家的独立和神圣主权来作交易。

反苏阴谋者在制定其罪恶计划时，直接遵循外国法西斯谍报机关的指示，在苏联各共和国、各地区和地方的一系列工业、运输、农业和供应企业中组织了捣乱分子和破坏分子网。

右派和托派阴谋的参加者与一些法西斯团体达成协议，除在战争爆发时把我方战线向这些法西斯国家的军队开放外，还准备破坏红军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国防工业。

阴谋者们在准备进行的一系列破坏和捣乱活动中，打算一旦爆发战争就炸毁和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主要国防企业。他们还准备毁坏军用列车，造成大量伤亡。

他们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使全国经济生活瘫痪，使部队粮食和军需品供应陷于停顿。

调查结果表明，阴谋者们实际上已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中采取了一系列这种捣乱和破坏的行动。

现已查清，外国谍报机关的奴仆、人民公敌托洛茨基在他给国内反苏阴谋的主要参加者的一些信件和个人指示中，曾要求他们加紧在苏联进行破坏和捣乱活动。

这一阴谋的主要参加者、被告克列斯廷斯基供认，一九三

三年，托洛茨基在梅拉诺亲自告诉他：

“如果托洛茨基能够告诉德国人，捣乱和破坏活动以及策划恐怖行动的工作实际上已在认真进行中，那么他与德国人谈判就更加容易了。”*

(第3卷,第54—55页)

调查表明，这一反苏阴谋的参加者在日本谍报机关和人民公敌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下，已在远东地区策划和采取了一系列捣乱行动。例如，他们遵循日本谍报机关的指示，在沃洛恰耶夫卡车站破坏了一列军用货车，并在霍尔至多尔米顿托夫卡铁路分段制造了五〇一次列车事故，死二十一人，伤四十五人。他们还遵循同一个日本谍报机关的指示，在苏昌的第十号矿坑和第二十号矿坑进行了捣乱活动。

(第45卷,第1—14页)

对托洛茨基发布这类指示的情况，被告罗森戈尔茨提供了详细的证词，他供称：

“我除了通过克列斯廷斯基和谢多夫得到过托洛茨基指示在对外贸易部门进行破坏活动以直接支援德国和日本外，我的破坏活动的性质还决定于我从某某两国驻苏大使N先生和N先生处得到指示，而在这件事情上同两位N先生联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必须根据他们的明确指示来指导我的工作。

* 请注意，克列斯廷斯基已恢复了名誉。

“我同图哈切夫斯基和李可夫建立联系以后，便将托洛茨基关于破坏活动的指示让克列斯廷斯基转告图哈切夫斯基，并由我本人告知李可夫。他们二人都赞同我已经做了的工作。

“采取以上措施的结果，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破坏活动就主要沿着三条渠道来进行：第一，让苏联花钱来从经济上援助德国和日本；第二，使苏联遭受经济上的损失和破坏；第三，使苏联受到政治上的损害。”*

（第6卷，第49页）

被告沙兰戈维奇遵循“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的指示在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工农业中进行了广泛的破坏活动。

关于此事，被告沙兰戈维奇供认：

“为了使我们的破坏计划付诸实施，我们在一些地区建立了一个破坏和捣乱小组的网。……我们当中所有的人，上自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下至普通成员，都是民族法西斯主义者，肆无忌惮地进行了旨在使白俄罗斯脱离苏联的反苏活动。”**

（第14卷，第40页）

被告切尔诺夫多年来一直与德国谍报机关联系，充当其在苏联的秘密间谍。他还利用他在苏联官居要职的有利条件，在德国谍报机关的指示下，组织了在农业部门的一系列捣

* 赫鲁晓夫已宣布图哈切夫斯基无罪，而克列斯廷斯基也恢复了名誉，因此这个情节也就站不住脚了。

** 参看本书第28页注。

乱和破坏行动。*

被告切尔诺夫也是德国间谍，他在供述与德国间谍、《柏林日报》记者谢菲尔的罪恶关系以及在农业部门的破坏活动时说：

“当我开始在农业储备委员会工作时，谢菲尔曾将德国人的指示交给我，要我在农业储备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内，尤其是在动员储备时，进行破坏活动。

“我从谍报机关接到的进行破坏活动的指示，与我作为右派组织成员而从李可夫接到的指示完全一致，因此我都一一执行了。”

(第8卷,第98页背面,第25页)

关于这一点，切尔诺夫还供认如下：

“一九三四年，我与李可夫在其乡间住宅会面，他指示我在农业部门进行广泛的破坏活动。我执行了这些指示，并且相当积极地从事了各种破坏和暗害活动。”

(第8卷,第93页)

调查表明，在乌兹别克的农业部门中也有不少蓄意破坏的活动；当地的一些民族主义的组织，通过其领导人被告伊克拉莫夫和霍扎也夫**，与反苏阴谋中心结成联盟，并进行活动。

被告法祖尔·霍扎也夫是这一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

* 切尔诺夫已恢复了名誉。

** 伊克拉莫夫和霍扎也夫已恢复了名誉。

一,他供认如下:

“我们并没有局限于只为我们反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准备干部,而且已在积极地进行着暗害苏联政权的工作。”

(第13卷,第66页)

被告伊克拉莫夫还完全承认,在乌兹别克曾广泛地采用各种破坏手段。他供认“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给他规定过下列任务:

“……一、在乌兹别克广泛地准备武装叛变,以便与外来干涉同时发动;

“二、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竭力进行破坏和捣乱,使其结果在劳动者中引起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从而为在适当的时候组织武装叛变创造有利条件。”

被告伊克拉莫夫说:“除此之外,我们破坏活动的目的还在于阻止苏联加强国防。”

(第12卷,第95—96页)

本案其他被告也是这样,除了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进行破坏活动外,也在农业方面进行破坏活动。

例如,被告格林科曾在财政部门从事破坏活动。

被告格林科供认:

“在财政人民委员会进行暗害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使苏联的卢布贬值,削弱苏联的财力,打乱经济,从而引起人民大众对苏维埃政权的财政政策和税收制度不满,对储蓄银行的工作效率以及迟

发工资等等不满。其结果就可以把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人广泛组织起来，而有助于阴谋家们发起聚众闹事的行动。”*

(第9卷,第79页)

被告捷连斯基以及他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和各合作社内组织的破坏集团，使诸如糖、黄油、蛋品、烟草等类货物供应计划失调，故意阻碍货物运往农村地区，竭力混乱帐目，这样就助长了盗窃和浪费国家财产而逍遥法外的现象，并鼓励了消费者进行套购和倒卖行为。

被告捷连斯基在讲到他要中央消费合作总社推行具有破坏性的商品和货币帐目时供称：

“在这些情况下，盗窃犯仍然逍遥法外，而诚实的工作人员则在这种复杂的会计制度下被弄糊涂了，并被立即指控为贪污。”**

(第10卷,第56页)

现已暴露的外国谍报机关的间谍、被告罗森戈尔茨，也进行了广泛的破坏性叛国活动。

罗森戈尔茨在交代他这方面的叛国活动时供认：

“至于托洛茨基与德国和日本达成一项协议的事，我是完全知道的。一次是在他们谈判期间，我于一九三三年与谢多夫会晤时得知；另一次是在他们已达成协议时，我于一九三四年与他本人会

* 格林科已恢复了名誉。

** 捷连斯基已恢复了名誉。

暗时得知的。我接到了托洛茨基的一些有关的指示，而我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破坏活动也是为了同一个目的。”

(第6卷,第48页)

阴谋者们在组织积极的捣乱和破坏活动的同时，还按照法西斯谍报机关的命令，负责在我国境内发起叛匪运动，其目的在于当爆发反苏干涉时，组织起他们的反苏叛匪，在红军后方进行武装暴动。

被告李可夫供认：

“我们采取的方针是以暴力推翻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并决定用组织富农暴动来保证这一方针的实现。”

(第1卷,第150页背面)

调查结果表明，在红军后方组织富农武装暴动，是法西斯国家准备进攻苏联的计划和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右派和托派阴谋者们则根据这些法西斯国家总参谋部的信号行事。

这一阴谋的参加者遵循法西斯谍报机关的指示，纠集叛匪干部，以便在苏联远东、北高加索和其他地方，尤其是在乌兹别克，发动积极的武装暴动。

关于此事，被告霍扎也夫*供认：

“我们各个组织的现行工作，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造就积极的反苏干部，培养他们与苏联作斗争的精神。我们要使组织内的各个

* 但这位被告已恢复了名誉。

成员都能接受这样一种思想，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必然要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发展为许多次的武装冲突。我们之所以把注意力集中到培养我们组织的战斗力上来，其原因就在于此。”

(第13卷,第66页)

叛匪干部的组织者们只能依靠一些残存的老反革命分子，因而把期望寄托在巴斯马奇叛乱分子和自卫军的残余(他们都是从国外偷偷地进入苏联的)，以及判刑的土匪和集中营的在押犯等人身上，把这些人当作自己叛乱的后备力量。

被告伊克拉莫夫*在交代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在乌兹别克发动的多次叛匪活动时供称：

“我们保存了必需的干部，以便将来用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这些干部主要是由富农、教士和前巴斯马奇叛乱分子的残余组成的。我们指示我们组织中那些在各个乡区居于领导职位的成员，保存这些干部。此外，我们还设想，在发生武装行动时，让一度不得不退出境外的巴斯马奇残部重新回到苏联境内。”

(第12卷,第56页)

根据调查材料和被告布哈林、朱巴列夫、捷连斯基和其他人的自供可以确认，他们都积极参加过培训叛匪干部的工作，企图尽可能多地控制苏联乡区；这一阴谋的领导人为了把叛乱基地扩大到最大限度，与一个非法的社会革命党组织建立了联系。

* 伊克拉莫夫也恢复了名誉。

例如,被告布哈林供认,

“与社会革命党人建立联系一事,可以追溯到右派组织把其希望寄托在富农暴动的时期。因为右派要组织这种暴动,就必须与扎根于农村富农阶级中的社会革命党人建立联系。

“……我自己就是通过谢苗诺夫同国内的社会革命党地下中央委员会建立联系的,而且还通过契列诺夫同巴黎的社会革命党旅外中央委员会建立联系。”

(第5卷,第90—91页)

这就是“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犯下的一系列可耻罪行,他们多年来为了敌视苏联的外国的利益而从事叛国活动。

二、谋杀苏联知名人士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尔基,以及一九一八年阴谋反对列宁

右派和托派阴谋者由于用间谍、破坏、捣乱和富农暴动等手段来推翻苏维埃制度的希望已经破灭,因而对苏联的怨气和仇恨就变本加厉,着手准备并进行对苏联党政领导人的恐怖活动。

调查结果表明,“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按照与德国和日本谍报机关达成的直接协议,并遵循人民公敌托洛茨基的指示,策划并执行了一系列对我国某些最优秀的人士的恐怖行动。

被告李可夫说明了“右派-托洛茨基联盟”采取恐怖方法的动机:

“由于右派反革命组织带有非法性和阴谋性,其反革命活动缺

乏任何群众基础，也没有通过任何其他办法取得权力的一切希望，因而其中心组织认为，采取各种恐怖方法和发动一次‘宫廷政变’，是有某种前途的。”

(第1卷,第50页)

被告布哈林在调查过程中承认，“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早在一九三二年就已采取了恐怖方法，其供词如下：

“也是在一九三二年，我与皮达可夫会晤和谈话期间，从他那里知道他曾与列·谢多夫会晤，并从谢多夫那里得到托洛茨基关于对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采取恐怖方法的直接指示。我还必须承认，就是在那时，我们实际上同意与恐怖主义者达成一项协议，而我和皮达可夫的谈话就是一项协议，以使用我们推翻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的暴力行动来配合托洛茨基。”

(第5卷,第105页背面)

阴谋者的恐怖行动是与他们的全部失败主义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例如，这一点已由被告伊凡诺夫的下列证词所证实：

“布哈林在讲到恐怖主义时说，‘干掉’（这是照他的说法）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对我们夺取权力将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将有利于在战时使苏联失败。”*

(第7卷,第81页)

阴谋集团遵循这方面的指示，广泛地发展恐怖小组组织，

* 伊凡诺夫已恢复了名誉。

并实际准备对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实行恐怖行动。

在这方面被告李可夫供认：

“到那时，我们已经把恐怖主义道路作为反对苏维埃政府的一种方法而加以采纳。……我们的这一立场使我们(尤其是我自己)采取了极为明确的活动形式，准备对政治局委员、党和政府领导人，首先是对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实行恐怖行动。一九三四年，我就已经指示我所建立的阿尔捷缅科恐怖集团，要它监视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汽车。”

(第1卷,第150页背面,以及第151页)

被告布哈林在讲到建议社会革命党人谢苗诺夫组织一个恐怖集团时供称：

“我要毫不隐瞒地坦白交代，这个建议是我在组织中心的一次会议上传达的，于是我们决定委托谢苗诺夫组织这个恐怖集团。”

(第5卷,第106页背面)

调查结果表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基洛夫被卑鄙地暗杀，是列宁格勒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主义中心干的，同时也是按照“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的决定行事的，这个联盟的一些成员正在本案中受审。

调查结果表明，被告雅戈达是这一卑鄙谋杀的参加者之一，他供认如下：

“暗杀基洛夫的准备工作是根据阴谋中心的决定进行的。我起先是从叶努基泽那里得知的。叶努基泽告诉我不要阻碍这一恐怖行动，我同意了。为此，我将扎波罗泽兹从列宁格勒召回，指示他不要阻碍正在准备中的对基洛夫的这一恐怖行动。”*

(第2卷,第209页)

这一情况在调查过程中已由扎波罗泽兹和叶努基泽证实。

右派和托派叛徒和阴谋家的暴力恐怖行动并不限于暗杀基洛夫。

根据本案调查结果证明,高尔基、明仁斯基和古比雪夫都

* 叶努基泽已恢复了名誉,并受到《真理报》的赞扬说:“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深深地崇敬他的英名。”(1962年5月19日;参见尼古拉耶夫斯基:《权力与苏联权贵》,第218页以及以后各页。)这就使雅戈达的证词以及后面李可夫关于“谋杀”高尔基的证据都毫无价值了。高尔基事实上患有肺结核,在68岁时去世。伊萨克·巴别尔是高尔基晚年经常的访问者,他告诉伊里亚·爱伦堡说,谋杀高尔基的那套说法全“是胡说八道”。参见爱伦堡文章,载《新生活》杂志1962年第5期第153页;乌拉姆的《斯大林其人与其时代》一书(艾伦·莱恩书店1973年版,第484页)曾加引证。但是,罗伯特·康奎斯特却提出证据说,高尔基的确是被毒死的,即使并非出于上述被告之手(同上书,第539页以及以后各页)。

是在“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联合中心指示下进行的恐怖行动的牺牲者。

关于右派和托派阴谋家对高尔基进行空前可怕的谋杀的原因，被告雅戈达供称：

“长期以来，右派和托派组织的联合中心尽量对高尔基施加影响，使他摆脱与斯大林的亲密关系。为此目的，派了加米涅夫、托姆斯基等许多人去接近高尔基，但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高尔基仍然忠于斯大林，而且是斯大林路线的热情支持者和拥护者。既然右派和托派正在认真考虑推翻斯大林的领导以夺取政权，那末中心就不能忽视高尔基在国内的特殊影响和在国外的威望。如果他还活着，就会出来反对我们。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当高尔基显然不可能脱离斯大林时，联合中心因而只好决定干掉高尔基。”

（第2卷，第200页）

被告李可夫完全证实了被告雅戈达的证词。李可夫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受苏联检察官审问时供认：

“我知道，托洛茨基通过他在联合中心的代表，竭力煽起对高尔基的仇视。这自然是因为托洛茨基完全知道，高尔基已认定他是一个恶棍和冒险家；并且，高尔基与斯大林的亲密友谊已是众所周知的，而他是斯大林政治上坚定的支持者这一点，引起了我们的组织对他的仇视。”

（第1卷，第166页背面）

对此，被告李可夫补充说：

“一九三五年，我与叶努基泽谈话。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联盟中属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的那些人坚持要消灭高尔基的政治活动，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次谈话使我清楚地意识到，可能也会提出用恐怖手段来干掉高尔基的问题。”*

（第1卷，第166页背面，第167页）

被告布哈林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供认，一九三五年初，托姆斯基曾告诉他：

“联盟的联合中心内属于托派的那些人建议组织一次反对高尔基的敌对行动，因为他是斯大林政策的支持者。”

（第5卷，第119页背面）

关于这件事，被告布哈林解释说，他并不排除当时所考虑的正是从肉体上消灭高尔基的这种可能性。被告贝索诺夫的证词也证明了当时确有准备从肉体上消灭高尔基的考虑。他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底与托洛茨基会晤时，得到了一张托洛茨基交给他本人关于此事的“便条”。

被告贝索诺夫供认，在这次会晤时，托洛茨基宣称：

“‘如果我们不立即着手有组织地从肉体上消灭斯大林及其所有的亲信，就是不可宽恕的过于拘谨。’

“‘高尔基和斯大林很亲密。他在争取世界、尤其是西欧的民主舆论对苏联的同情方面，起了特殊的作用。高尔基作为斯大林的亲密朋友，作为党的总路线的传达工具，是很得人心的。以前拥

* 但是叶努基泽还是恢复了名誉。

护我们的知识分子当中，很多人在高尔基的影响下离开了我们。由此我作出结论，必须干掉高尔基。这一指示要十分明确地转告皮达可夫：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从肉体上消灭高尔基。’”

(第 11 卷, 第 74—75 页)

正是根据人民公敌托洛茨基的这一指示，“右派-托洛茨基联盟”通过了谋杀高尔基的罪恶决定。

被告雅戈达供认：“这一指示是委托我来执行的。”

被告雅戈达收罗来执行这一罪恶计划的人有：本案被告列·格·列文（高尔基的前家庭医生）、德·德·普列特涅夫教授、高尔基的秘书彼·彼·克留奇可夫和雅戈达的私人秘书巴·彼·布拉诺夫。

这一罪行的组织者之一被告布拉诺夫供认：

“普列特涅夫教授、列文医生和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可夫直接参加了谋杀高尔基。例如，我曾亲眼看到雅戈达如何经常召见克留奇可夫，要他使高尔基着凉，想办法让他病倒。雅戈达着重指出，高尔基的肺部很弱，即使伤风引起的任何疾病都会增加他死亡的可能性。其余的事将由普列特涅夫和列文来做，他们已得到了这方面相应的指示。”*

(第 16 卷, 第 72 页)

被告普列特涅夫直接参加了谋杀高尔基和古比雪夫，他供认：

* 克留奇可夫已恢复了名誉（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

“雅戈达告诉我，必须帮助他从肉体上消灭国家的某些政治领导人。他直截了当地建议，我应该利用我做古比雪夫和高尔基医生的有利条件，采用错误的治疗方法，来加速他们的死亡。我曾试图拒绝，但是最后还是被迫同意了。于是，雅戈达通知我，列文医生将是我的同谋；参与此事的还有高尔基的秘书彼·彼·克留奇可夫。”

“我接受了雅戈达布置的这一可怕的任务，便和列文医生联系，拟出了一个杀害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的计划。

“我必须供认，我的反苏情绪在我同意这一罪行时起了作用。直到我被逮捕时为止，我一直尽量隐瞒着这些反苏情绪，而花言巧语地把自己说成是苏维埃的拥护者。”

(第18卷,第72—73页)

被告列文证实了这一情况，他供称：

“我承认，由于故意采用错误疗法和开给不对症的处方，我和我的同谋一起，按照雅戈达的意旨，使马克辛·高尔基和古比雪夫死于非命。”

(第17卷,第10页)

在调查过程中，被告列文和普列特涅夫就他们所实际安排的杀害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的方法作了详细的交代。

调查结果表明，古比雪夫的秘书、被告马克西莫夫曾积极参加杀害古比雪夫。马克西莫夫供认：

“作为反革命右派组织的一个成员，我承认这一罪行。我早在一九二八年就参加了这个组织。

“雅戈达也知道我属于这个反革命组织，并且在我和叶努基泽的一次谈话时，他也在场；当时我们制定了干掉古比雪夫的

计划。”*

(第 20 卷, 第 45 页背面)

被告列文医生和卡扎可夫医生直接遵循雅戈达的指示, 还谋杀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明仁斯基。

被告卡扎可夫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受苏联检察官审问时供认:

“雅戈达告诉我, 明仁斯基喜欢并信任我, 因此列文医生和我可以成功地干掉明仁斯基。雅戈达给我下达了下列指示: 我必须和列文医生一起, 为明仁斯基制定出一个治疗方法, 加速其死亡, 并尽可能快地结束他的生命。……”

(第 19 卷, 第 51 页背面)

被告卡扎可夫与被告雅戈达继续商谈中, 雅戈达讲到了加速明仁斯基死亡的必要性, 卡扎可夫供称:

“在和雅戈达这次谈话以后, 列文和我为明仁斯基制定了一个治疗计划, 它实际上彻底毁掉明仁斯基的健康, 而且必然加速他的死亡。于是, 列文和我便实际上按照下述方式杀害了明仁斯基。

“我交给列文医生一种由我配制的复方溶剂, 这种复方溶剂含有生物碱, 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结果, 也就是说, 实际上谋害明仁斯基。”

(第 19 卷, 第 51 页背面)

* 但是, 现在却承认叶努基泽在这件事上是无罪的。

被告列·格·列文和巴·彼·布拉诺夫充分证实了此事。

被告列·格·列文供认，在接到被告雅戈达加速明仁斯基死亡的指示后，他(列文)决定让卡扎可夫医生参加这一罪行。

被告列文供称：

“我说过，这项工作由卡扎可夫来做可能最为合适，因为他可以使用在其私人实验室里亲手任意配制的药物，而他注射的是什么药也只有他知道。

“在和卡扎可夫初谈后，我向他传达了我从雅戈达那里接到的指示。他起初十分踌躇，害怕罪行暴露，但是最后他同意了。我没有问他打算使用什么药，主要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药物总是保密的。但是我知道他在这方面有充分的机会。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明仁斯基是在马克辛·彼什科夫(高尔基的儿子)去世的前一天于睡眠状态下猝死于心脏麻痹的。我不怀疑，这就是卡扎可夫干的。”

(第17卷,第54—55页)

关于谋杀明仁斯基的问题，被告布拉诺夫供认：

“雅戈达很久以前就抱有从肉体上消灭明仁斯基的想法。他好几次当着我的面表示对明仁斯基继续活着并占据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首脑的职位感到不满。后来他直率地说，一定得干掉明仁斯基。安排列文医生来做这项工作是有困难的，因为明仁斯基不喜欢列文，并已拒绝由他看病。于是我建议雅戈达给明仁斯基另外‘配备’一个医生。他果真这样做了。在列文医生的帮助下，给明

仁斯基‘配备’了卡扎可夫医生。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说穿了就是故意处治不当，加速了明仁斯基的死亡。”

(第16卷,第75页)

被告列文和克留奇可夫除了谋杀高尔基和古比雪夫之外,还直接遵循雅戈达的指示,在一九三四年以同样的方法杀害了高尔基的儿子马·阿·彼什科夫。

在这方面,被告列文供称:

“我承认我谋杀马克辛的罪行,而且要在这里说,我是在雅戈达的直接要求下做的。我没有勇气拒绝,就成了杀人犯。”

(第17卷,第138页背面)

被告克留奇可夫积极参加了雅戈达组织的这一罪行。他供称:

“我是在右派反苏组织某些成员的指示下,尤其是在雅戈达的指示下,犯下这些罪行的。我就是从雅戈达那里得到指示,才迫不得已干掉马克辛·彼什科夫,然后再干掉阿列克舍·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

“除我本人外,雅戈达还把这些罪恶任务委托给了列文医生和维诺格拉多夫医生,以及普列特涅夫教授。”*

(第21卷,第16页)

被告雅戈达证实彼什科夫是按照他的指示被杀害的,他

* 克留奇可夫已恢复了名誉。

供称：

“一九三四年五月，在克留奇可夫的帮助下，使马克辛（马·阿·彼什科夫）得了双叶肺炎，而医生列文、维诺格拉多夫和普列特涅夫则用促其死亡的方法给他治病。”

（第2卷，第193页）

被告雅戈达在被撤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职务后，还设法要谋害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尼·伊·叶若夫* 同志。

被告雅戈达在其证词中交代了促使他加速对叶若夫采取恐怖行动的动机：

“我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并任命叶若夫来接替我，意味着我们阴谋的彻底破产，因为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要搜捕反苏组织的干部。叶若夫定要追查一切。必须干掉叶若夫。这是我能作出的唯一决定，而且我开始积极准备将这一决定付诸实施。”

（第2卷，第141—142页）

* 叶若夫后来终于被斯大林顺利地处决了。斯大林嗣后对雅科夫列夫说：“叶若夫是一个恶棍。他杀害了我们最优秀的人。此人很堕落。你在部里找他，说他到中央委员会去了。你到中央委员会去找，又说他在工作。你派人到他家里去找，他正酩酊大醉地躺在床上。他毁掉了多少人啊！为此，我们把他枪决了。”（雅科夫列夫语，引自乌拉姆：《斯大林其人 与其时代》，第487页）

雅戈达曾企图通过他的同谋者来执行他的计划，而在这方面被告布拉诺夫起了重要的作用。

被告雅戈达和被告布拉诺夫供认，曾打算用专门配制的毒剂来达到谋杀叶若夫的目的。

被告布拉诺夫供称：

“在雅戈达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职务后，他直接给我和他的代理人沙沃莱宁下达了毒死叶若夫的指示。”

(第16卷,第27页)

被告布拉诺夫在详细交代被告雅戈达企图谋杀叶若夫同志所使用的方法时供认，他(布拉诺夫)亲自准备了用来毒死叶若夫同志的毒品配剂。

被告雅戈达在苏联检察署受审时，全部招认犯有这一罪行。他供称：

“是的，我必须承认，我为策划这一罪行曾作过一些准备。我作准备的目的是要谋杀叶若夫，因为他对反革命阴谋来说是一个危险人物，他可能揭穿我们的反革命组织。”

(第2卷,第209页)

因此，调查当局认为这一点已确定无疑，即本案中提交刑事诉讼的“右派 - 托洛茨基联盟”的领导成员们，对谢·米·基洛夫、维·鲁·明仁斯基、瓦·弗·古比雪夫、阿·马·高尔基和马·阿·彼什科夫犯有恐怖罪行，而且还准备了其他一系列因时间关系而未遂的恐怖行动。

谋杀苏维埃知名人士，就全部完成了这一卑鄙的政治罪行。这帮卑鄙的卖国贼、沙皇秘密警察的暗探和外国谍报机关的走狗正是通过这些罪行，出卖我们的国土和自由给外国资本家，竭力实现一个在我国推翻苏维埃制度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法西斯计划。

* * *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无论是在托洛茨基分子案件还是右派案件中，他们的这些滔天罪行都不是偶然的。

调查结果表明，早在一九一八年，即十月革命刚刚结束、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缔结的时候，布哈林及其所谓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和托洛茨基及其集团，就勾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策划一项阴谋，反对苏维埃政府首脑弗·伊·列宁。

正如调查材料表明的那样，布哈林和其他阴谋者的目的，是要阻止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推翻苏维埃政府，逮捕和杀害弗·伊·列宁、约·维·斯大林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组织一个由布哈林分子(当时他们为掩饰起见，自称为“左派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新政府。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左派”社会革命党前中央委员弗·阿·卡累林在受苏联检察署讯问时，就有关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哈林分子在一九一八年的阴谋活动作了如下证明：

“在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就在反对以列宁、斯大

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为首的苏维埃政府的问题上同‘左派共产主义者’达成了最后协议。

“根据‘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由卡姆可夫、朴罗西安和我本人同‘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谈判。”

(第44卷,第86页)

卡累林在讲到这些谈判的性质和被告布哈林所起的作用时,进一步证实:

“布哈林建议我们,不要仅仅逮捕政府官员,而要从肉体上消灭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首先是消灭列宁和斯大林。”

(第44卷,第38页)

本案传讯的其他证人也证实了这一情况。

“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卡姆可夫承认:

“我曾与布哈林面谈。在谈话中,他所谈大约如下:‘我们党内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上反对列宁立场的斗争日趋尖锐。在我们组织内部正在谈论建立一个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组成的新政府的问题。’布哈林提到皮达可夫可以作为新政府领袖的候选人,并说出他们的想法是要逮捕以列宁为首的政府成员来改变政府。”

“同布哈林的进一步谈判是由卡累林和朴罗西安进行的。到三月底,‘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最后达成了下列协议:一、在反对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的斗争中,‘左派共产主义者’应给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组织上和政治上的援助;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应与‘左派共产主义者’联合行动,

以推翻列宁的政府，并建立一个由‘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新政府。

“此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便组织了暗杀米尔巴赫的事件和七月暴动。‘左派共产主义者’对暗杀米尔巴赫和七月暴动的准备工作是完全清楚的。”

(第44卷,第92页背面)

在苏联检察署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九日的讯问中，“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中的几位前领导人和积极成员雅柯夫列娃、奥辛斯基和曼泽夫以证人资格完全证实，反对列宁担任苏维埃政府首脑的阴谋，早在一九一八年就由“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根据被告布哈林的 建议策划好了。

例如，瓦·尼·雅柯夫列娃承认：

“布哈林向我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即政治斗争达到了空前尖锐的形式，各种问题都再也不能仅仅用对党中央缺乏信任这一政治公式来概括了。布哈林宣称，更换领导已不可避免，因而正在讨论逮捕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的问题，甚至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第44卷,第77页)

关于此事，瓦·瓦·奥辛斯基承认：

“我向布哈林主要谈了我们推翻列宁政府的措施。……大约在一九一八年五月(或者四月底)我和布哈林谈了一次话，我问他，我所得到的关于他制订逮捕列宁计划的消息究竟可靠到什么程度。

“布哈林不曾否认他有那样的计划。”

(第44卷,第54页)

奥辛斯基在进一步讲到这些“措施”时承认:

“我是先后从雅柯夫列娃和布哈林那里知道‘左派共产主义者’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联盟的情况的。我还从他们那里得知,一九一八年三月或四月,布哈林在(莫斯科州)局会议上建议逮捕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布哈林进一步强调说,他认为在逮捕政府领导人以后,应该把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从肉体上加以消灭。”

(第44卷,第88页背面)

弗·尼·曼泽夫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受苏联检察署讯问时,提出了同样的证词:

“我证实,‘左派共产主义者’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建立了联盟。”

“我证实,大约在三月或四月,在这个局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布哈林作了一个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对苏维埃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诽谤,并建议组织力量来推翻苏维埃政权,逮捕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其目的是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第44卷,第82页)

被告布哈林交代托洛茨基在一九一八年阴谋反对列宁中所起的作用时供认:

“当时再次提出了发动政变以及逮捕党和苏维埃领导中著名人物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的想法。这次是根据托洛茨基的建议而提出来的。他显然已知道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建议了——我推想，是通过皮达可夫知道的。”

(第5卷,第124页)

在初步调查中传讯瓦·尼·雅柯夫列娃时,她证实说:

“托洛茨基认为,政治斗争才刚刚开始,很可能表现为最具有进攻性的形式;‘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和平问题上反对列宁的立场,一定会得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党派的支持,因此必须做好改变政府和逮捕以列宁和斯大林为首的政府领导人的准备工作。托洛茨基认为,在如此尖锐的革命时期,如果斗争发展下去,就不仅限于逮捕几个领导人。逮捕以后,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会提出从肉体上消灭他们的问题。”

(第44卷,第78页)

在初步调查中讯问了“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领导人之一弗·尼·曼泽夫,他证实说:

“在我与雅柯夫列娃谈话几天以后,托洛茨基要我去看他。我在他家里与他进行了长谈。在谈话中,他详细说明了必须杀害列宁和斯大林的想法。”

(第44卷,第84页)

调查当局现已掌握的可靠证据足以证明,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卡普兰于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想夺去列宁生命的卑

鄙企图,就是实现“左派共产主义者”罪恶计划的直接结果。“左派共产主义者”以布哈林为首,其同谋为“左派”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而被告布哈林则是这一计划的创始者。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九日,卡累林在受苏联检察署传讯时承认:

“我还得承认一个严重罪行,那就是参加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企图杀害列宁的组织工作。这件事已经对苏联人民隐瞒了二十年。同时还隐瞒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是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一道,在布哈林的帮助下,企图谋杀列宁的。在审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时,没有把他们在这一罪行中的真实情况揭发出来,也没有揭露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

“在七月暴动以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中央委员会曾决定在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斗争中采用恐怖手段。

“应该指出,甚至在暴动失败后,朴罗西安还和布哈林会晤过几次。布哈林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从肉体上消灭列宁的问题。更正确地说,对列宁采取恐怖行动的问题,是布哈林在一九一八年七月下半月提出来的。朴罗西安将此事告诉了我们这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

“‘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这一要求,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加速对列宁的恐怖行动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44卷,第86—87页)

瓦·瓦·奥辛斯基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九日讯问时供认:

“一九一八年底，斯图柯夫（他同布哈林一起与社会革命党人联系过）告诉我，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向列宁开枪，不仅是执行右派社会革命党领导的指示，而且也是贯彻‘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与社会革命党人商定的措施，其目的在于从肉体上消灭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

（第44卷，第89页）

被告布哈林同证人奥辛斯基、雅柯夫列娃、曼泽夫、卡累林和卡姆可夫在苏联检察署对质时，各证人完全确认他们以上提供的证词。

在罪证如山的情况下，被告布哈林承认了若干犯罪事实，并供称：

“我得承认，我们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有过直接联系，他们的行动纲领是以暴力推翻以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为首的苏维埃政府，随即逮捕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并建立由‘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新政府。……”

（第5卷，第122页背面）

现在，关于被告布哈林和人民公敌托洛茨基于一九一八年反对弗·伊·列宁、约·维·斯大林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犯罪事实既已确立，则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匪帮随后的整个反革命罪恶活动便真相大白了。他们目前被控于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七年间接遵循法西斯谍报机关的指示而犯有严重的叛国罪行。

控 诉 理 由

经调查当局确定：

一、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本案被告遵循敌视苏联的外国谍报机关的指示，组织了一个被称为“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的阴谋集团，旨在充当外国间谍，从事破坏、捣乱和恐怖活动，暗中破坏苏联的军事力量，煽动各敌国进攻苏联，使苏联战败和遭受瓜分，并为了上述外国的利益，使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细亚各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远东滨海区脱离苏联，最后达到其推翻苏联现存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的目的；*

二、“右派-托洛茨基联盟”里通某些外国，旨在取得它们的武装支援，以实现自己的罪恶计划；**

三、“右派-托洛茨基联盟”一贯地为这些国家从事间谍活动，把极端重要的国家机密情报供给外国谍报机关；***

四、“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有计划地在社会主义建设各部

* 正如前面看到的那样，这些指控都是捏造的。

** 克列斯廷斯基和图哈切夫斯基的昭雪，给这些指控留下了一个大漏洞，使其再也站不住脚了。

*** 在一九六四年的一次全苏历史学家会议上，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别洛夫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布哈林和李可夫都不是间谍或破坏分子。”（康奎斯特：《大恐怖》，第690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

门(工业、农业、铁路、财经管理、城市发展等)进行破坏和捣乱活动;*

五、“右派-托洛茨基联盟”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人组织了一系列的恐怖行动,并对谢·米·基洛夫、维·鲁·明仁斯基、瓦·弗·古比雪夫和阿·马·高尔基犯下了采取恐怖行动的罪行。**

由于既有证人的证词,又有档案文件和证明材料,全体被告已被证明为有罪,而且他们已经完全承认对他们指控的罪行。

根据上述情况,下列人犯,

一、布哈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生于一八八八年);***

二、李可夫,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生于一八八一年);****

三、雅戈达,亨利希·格里哥里也维奇(生于一八九一年);

四、克列斯廷斯基,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生于一八八三年);

五、拉柯夫斯基,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基也维奇(生于一八七三年);

* 由于给一些人身后平反昭雪,这些鸡毛蒜皮的罪证完全证实布哈林在审讯中的翻供是对的。

** 这些指控也因为给一些人恢复了名誉而漏洞百出。

*** 布哈林被拒绝在身后平反。

**** 李可夫也被拒绝在身后平反。

- 六、罗森戈尔茨，阿尔卡迪·巴甫洛维奇（生于一八八九年）；
- 七、伊凡诺夫，弗拉基米尔·伊凡洛维奇（生于一八九三年）；
- 八、切尔诺夫，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一八九一年）；
- 九、格林科，格里哥里·费多罗维奇（生于一八九〇年）；
- 十、捷连斯基，伊萨克·阿布拉莫维奇（生于一八九〇年）；
- 十一、贝索诺夫，谢尔盖·亚历克舍也维奇（生于一八九二年）；
- 十二、伊克拉莫夫，阿克马尔（生于一八九八年）；
- 十三、霍扎也夫，法祖尔（生于一八九六年）；
- 十四、沙兰戈维奇，瓦西里·佛米奇（生于一八九七年）；
- 十五、朱巴列夫，普罗科皮·基莫菲耶维奇（生于一八八六年）；
- 十六、布拉诺夫，巴维尔·彼得罗维奇（生于一八九五年）；
- 十七、列文，列夫·格里哥里耶维奇（生于一八七〇年）；
- 十八、普列特涅夫，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生于一八七二年）；
- 十九、卡扎可夫，伊格纳蒂·尼古拉耶维奇（生于一八九一年）；
- 二十、马克西莫夫-季科夫斯基，维尼阿明·阿达莫维奇〔阿布拉莫维奇〕（生于一九〇〇年）；

第二十一、克留奇可夫，彼得·彼得罗维奇（生于一八八九年），*

被控为反苏阴谋的积极参加者，犯了上列控诉理由一至五条的严重叛国罪行，亦即犯了苏俄刑事法典第五十八条中第一项第一款、第二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九项和第十一项所规定的罪行。被告伊凡诺夫、捷连斯基和朱巴列夫除犯有上述罪行外，还犯有苏俄刑事法典第五十八条第十三项所规定的罪行。

基于上述各点，所有上述被告应交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

* 由于设计出来的情节彼此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因此给二十一个人当中的七个人恢复了名誉，就使得整个罪情的设计破绽百出。另外，对叶努基泽和鲁祖塔克，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波兰同事，以及其他人士，可以说是在死后才偷偷地宣判无罪的，这就使得除了荒诞无稽的反列宁阴谋（在最后的控诉理由中却未列举此项）以外，差不多的事都真相大白了。

当然，所有这些罗织的罪状都是既恶毒又令人十分厌恶的。本来只要传讯一个证人，就能更快地予以否定。尼·谢·赫鲁晓夫在被迫退休后，用磁带录下他的回忆录时说道：

“就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前，我召见了总检察长鲁金科同志，他在三十年代大清洗期间曾参与过许多案件的审讯工作。我问他：‘鲁金科同志，我想了解一下那几次公开审讯的情况。告诉我，在对布哈林、李可夫、西尔佐夫、洛米纳泽、克

判庭审判。

瓦·瓦·奥辛斯基、瓦·尼·雅柯夫列娃、弗·尼·曼泽夫、弗·阿·卡累林、乌·德·卡姆可夫、英·尼·斯图柯夫、叶·瓦·阿尔捷明科、伊·瓦·扎波罗兹涅茨、伊·马·萨沃莱宁、格·伊·谢苗诺夫和斯·乌·契列诺夫各案，已经分别审理。

医生阿·伊·维诺格拉多夫一案，因其去世而已了结。

阿·什·叶努基泽一案已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经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理。

本公诉书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制定于莫斯科。

苏联检察官安·维辛斯基

列斯廷斯基以及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和政治局的其他许多知名人物提起公诉时，有多少真实的事实根据？

鲁金科同志回答说，从司法准则的观点来看，并没有任何证据足以把那些人定罪或甚至提交审讯。因为对他们起诉的根据，都是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严刑逼出来的口供，而这样逼出来的口供是不能作为把一个人送交审讯的合法依据的。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决定，在我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不谈那几次公开审讯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做法是有一些暖昧的。我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由于当初在审问和判决李可夫和布哈林等人民领袖的时候，有一些兄弟党的代表也在场。这些代表回国后，曾在他们本国证明这些判决是公正的。我们不愿意让那些参加公开审判的兄弟党代表失信于人，所以我们无限期地搁置了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和其他人的平反。我现在认识到，我们的决定是一个错误。当时要是把一切事情都讲出来就好了。纸总是包不住火的。你不能永久使这类事情保持秘密。”¹

注 释

- 1 《赫鲁晓夫回忆录》，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1971年版，第352—353页。这本书的第一卷在美国出版时，赫鲁晓夫曾予以否认；但是接着出版的第二卷里，对第一卷的出版情况提出了很能说明问题的证据，足以证明它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赫鲁晓夫的著作。这本书是根据录制赫鲁晓夫口述回忆的磁带编辑的，因此有两种出错的可能：一种是抄写错误，另一种是赫鲁晓夫自己记错和缺乏必需的文件而造成的错误。但是此处引用的一段则不可能有这两种错误；我们可以肯定，这正是赫鲁晓夫讲过的话。

第四章

全世界都感到内疚

赫鲁晓夫对外国共产党领袖情绪的照顾，不仅由于谨慎小心。这里出于对一种情况的考虑，而为了掌握国际舆论对这一争论的全部意义，是必须理解这一情况的。当苏联领导人决定谴责斯大林遗产中一些最坏的东西时，涉及各个“兄弟党代表”也是很客气的，因为所有共产党虽然在意识形态上都属于一个强大的共同体，在实际地位上却是彼此独立的。但是，在当年莫斯科的那几次审讯时，共产主义运动还依旧统一在唯一的世界性组织共产国际的结构内；而共产国际则对所有成员国的共产党享有权威。因此，在审讯中就根本谈不上有一个纯粹“俄国的”政策。因为共产国际仍然可以发号施令，而为大清洗作辩护的全部任务，便成了一道加给所有成员组织的强制命令。共产国际在苏联的卵翼下已完全一体化了，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在布哈林可能受到其苏联同事的迫害之前，他本来完全可以设法抢先一步向共产国际发出呼吁，因为按照共产党的惯例，共产国际表面在司法上是比联共（布）中央高一级的机关。但在发生这次具体事件时，任何人都未能朝着这方面去想，因为共产国际整个机器，显然在实际上不仅受控于苏联当局，因而也由斯大林个人摆布。由于这个原因，

一些外国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在替那几次审讯涂脂抹粉上就帮了大忙。哈里·波立特在处决布哈林时写道:

“莫斯科对二十一个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分子进行审讯,有力地 向全世界证明了苏联的强大和力量……”

苏联国内所有那些怀疑政府有无建设社会主义能力的集团,那些失去信心和不能在克服困难的艰巨斗争中继续前进的集团,以及那些对于苏联政府在政治斗争中所遵循的政策进行破坏的集团,都想抱成一团,以他们极不光彩的活动,妄图阻止或破坏千百万人正在毕生从事的伟大建设。

现在,法西斯主义已在德国掌权,而军国主义的法西斯政权也在日本得势。这两个国家在英国的扶持下,已变成了‘东方和西方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两个堡垒’。

于是,苏联国内的破坏分子必然要和德日两国结成共同的战线。这个大阴谋正在目前的审讯中暴露出来。它同以前几次审讯的情节是牵连在一起的。在这里不需要对证据作详细的介绍或解释,因为它本身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了。

这块肿瘤的根子就要被无情地割掉。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即人们尽管对‘自供’有很多议论,可是问题并不在于这些罪犯的罪行都是自供出来的。这些罪犯在司法当局提出的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他们再也隐瞒不住真实情况了。

你们一定记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面临死刑的时候摇尾乞怜,并且大声喊道,他们全都坦白交代了。事实表明,同他们仍然隐瞒的相比,他们根本没有坦白什么。雅戈达的证词就确证了这一点。只是经过苏联当局耐心而艰巨的工作,全部事实现在才大白于天下的。”¹

当然,只要仔细阅读一下审讯记录就会看到,布哈林根本

没有“供认”什么具体的罪行，并且除了别人的“供词”外，对他的罪行没有提出任何物证。²的确，在他最后的答辩中，有一点是他坚持到底的，即认为“招供是中世纪的法学原则。”³在布哈林的答辩中，他承认自己“有罪”，是从道德和政治这一总的意义来说的，同任何具体的犯罪行为都沾不上边。人们现在普遍相信，这种抽象的答辩，是为了保全他年轻的妻子拉林娜和他们的幼子的性命。但是波立特显然还来不及彻底弄清审讯记录，就得把他的那份手稿送给实际上于三月十九日出版的《国际通信》发表，这同他所评论的那个事件收场才相隔几天。波立特在当时对苏联政府信任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人们不难相信，对于苏联方面可能做出的坏事，是不会引起他的异议的。的确，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就热情地夸称“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叶若夫都是些钢铁人物……”⁴

相反的，赫鲁晓夫却告诉我们：

“不是贝利亚造就了斯大林，而是斯大林造就了贝利亚。而在贝利亚以前，斯大林还造就了叶若夫。‘黑莓’和‘装甲的拳头’就是斯大林给叶若夫取的绰号。在叶若夫以前，还有雅戈达。雅戈达也是斯大林一手造就的。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上了台又下了台。斯大林创造的这些主要角色的迅速更迭，同斯大林的一套逻辑大有关系。他利用这些心腹来摧残他明知在党和人民看来都是清白无辜的老实人。然后，斯大林自己站在超于一切的地位，让恐怖本身去毁灭恐怖的执行人。当一伙凶手在恐怖活动中卷入太深时，他就干脆用另外一批人来把他们替换掉。这就是那三班人马依次登台的由来：先是雅戈达，其次是叶若夫，然后是贝利亚。……”⁵

秉公而论，在这些杀人魔王当中的任何一个垮台以后，波

立特从未对他们的垮台提出过异议。但只要他们的垮台还未成为既成事实，每一个都仍然是他心目中的“钢铁人物”。

英国人不应该相信，波立特是太易于受骗或被收买。共产国际的任何一个主要领导人几乎都摆脱不了一种无情的压力，迫使他们异口同声地赞同这几次审讯。季米特洛夫在对待季诺维也夫的审讯案时，为共产党人的官方反应提供了一个模式，他说：

“审讯那些作为法西斯代理人的恐怖分子，是国际工人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⁶

季米特洛夫本人是希特勒德国国会纵火案审讯中的英雄，这对西欧来说，是尽人皆知的。这一点就为他的这一判断的可靠性提供了重要的保证。陶里亚蒂在《共产国际》杂志上撰文斥责“匪徒们”犯下“渎神的罪行”，并认为一九三六年的公开审讯是“考验我们阶级警惕性的一块试金石”。⁷若干年后，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六日的一次会见记者中，陶里亚蒂毕竟表示希望全部审讯都能有某种合符事实的根据，即使他的这种表示比他往年的习惯做法更带有勉强性，他说：

“目前人们正在谴责违反法制和采用非法的和不道德的诉讼方法，但这种谴责到底是涉及到那几次审讯的整个时期呢，还是比我提及的更近的某一特定时期，这一点我们还没有搞清楚。

我重申，就最初的那几次审讯而论，我们还能有考虑的余地，但是后来的审讯大部分都是不公开的，因此我今天的看法是，其中有两种成分同时存在：反对派既有采取恐怖行动反对政府的不轨图谋，政府也采用了道德上应受责备的非法诉讼方法。前一种成分自然冲淡不了后一种成分的严重性。”⁸

应该为陶里亚蒂说句公道话，他显然以为，在赫鲁晓夫的揭发以后，势必会作出某些努力，确认已实际存在的这两种成分混杂的状态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并且至少对“后”几次审讯的判决会给予重新甄别。可是这种对伸张正义的关心，在D·N·普里特^①最近的回忆录中却是找不到的。普里特是为第一次审讯进行辩护的最著名的同路人，他为此曾写过一些的确是轻率的文章和小册子，并以一篇充满恭维话的前言来吹捧左翼图书俱乐部对后几次审讯的叙述。⁹他在为他参加过的一九三六年审讯吹嘘的一段话末尾，还附带对当时苏联的态度作了简短的说明：

“在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时期的灾难性弊病以后，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对这个案件的看法如何。我想，最好还是让我对审讯的叙述保持不变。”¹⁰

奇怪的是，无论普里特也好，或者比他更著名的所有评论家也好，在这同一问题上的热情都还没有减退。

谁也不应认为，只有共产党人才会不加批判地接受苏联官方的观点。比方丘吉尔¹¹，还有美国大使戴维斯，就都曾经倾向于接受“破坏分子”的确捣过乱的说法。例如，下面就是戴维斯大使仅凭直觉而得出的印象：

“在俄国，没有造成里通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所谓‘内部侵略’。

^① 普里特当时是英苏文化协会主席。1940年因政见不合，被英国工党开除。1945年被苏联授予国际和平奖金。——译者

一九三九年希特勒进军布拉格，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汉莱因组织积极的军事支援。希特勒入侵挪威的情形也是如此。在俄国遭到侵略时，却没有苏台德的汉莱因分子，没有斯洛伐克的提索分子，没有比利时的德格雷尔分子，没有挪威的吉斯林分子……

在我参加旁听过的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进行的所谓叛国案审讯或肃反审讯中，都曾经有人提到过这一类的情况。在重新检视这些案件的记录和当时我写的东西以后……我发现，俄国的那些自己交代出来的‘吉斯林分子’在这些审判中的供词和证词，实际上已经把我们迄今所知道的德国第五纵队活动的各种鬼蜮伎俩全部揭发和交代清楚了……

所有这些审讯、肃反和清算斗争，那时看来虽是如此暴烈，如此震惊世界，但现在则已十分清楚，这是斯大林政府有力而果断的措施之一，不仅预防内部的叛变，而且预防外部的进攻。他们彻底清理和扫除了国内的所有叛逆分子。所有放心不下的事，都在有利于苏联政府的情况下得到了解决。

一九四一年俄国没有第五纵队分子，因为他们已被枪毙。清洗使国内纯洁了，替国家除掉了叛逆。

轴心国在苏俄的第五纵队被粉碎了。”¹²

当然，戴维斯的这种看法完全错了，因为尽管发生了希特勒占领苏联领土的丑行，仍有大量的苏联公民应征参加了叛徒弗拉索夫将军的军队。另一方面，由于战前处决了大批红军最杰出的领导人，无疑地削弱了苏联抗击侵略的力量。虽然如此，这位驻苏大使却是代表着世界上那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他既然完全乐于相信斯大林最无耻的捏造，那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共产党在干坏事时并不是孤立的。

遗憾的是，还有一些更为花言巧语的社会主义辩护士，对

于所谓阴谋的说法给予支持。著名的就是韦伯夫妇，他们把那种说法全盘接受下来，而且他们的话被大量地引用来证明镇压的必要性。

悉尼·韦伯和比阿特里斯·韦伯在为他们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一种新的文明》一书写再版后记时，竟能够用他们过去戳穿英国济贫法诀窍和宣传英国工会优点的那种俨然公允的口气来说话。他们觉得很多共产党的声明都表现得那样冷静，那样心平气和，而且完全没有激动情绪，便借助他们相当大的威望来支持维辛斯基反对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案件。在头几次审讯以后，他们有意地从他们先前那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中去掉了那个问号^①。现在，他们总结说：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列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主要官员（基洛夫）被一个解雇了的雇员暗杀了。此人也许出于个人报复而独立地采取行动，但也发现他与一些牵涉面很广的阴谋集团有着秘密联系。政府对这一谋杀案的反应是马上进行了审讯和宣判，并立即处决了一百多个涉及到的人，他们虽然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同暗杀基洛夫一事或者同与此有关的阴谋有任何联系，但无疑犯了非法进入市区并违禁携带武器和炸弹的罪行。这些阴谋已在一九三六年间几次连续的审讯中逐渐真相大白，其中包括对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其他一些次要角色作的公判和即时处决。

一九三七年一月，又对几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如皮达可夫、谢列勃里亚科夫、拉狄克和索柯里尼柯夫，以及其他一些在国外不太有名的人提出了刑事诉讼，指控他们阴谋用武力推翻苏联政府，并

^① 韦伯夫妇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一种新的文明》一书初版于1935年，当时书名虽带有问号，仍受到英国保守党甚至工党报刊的猛烈攻击。——译者

为此目的与德日两国政府的间谍进行叛逆性联系；企图暗杀莫洛托夫等领导人，并恶毒破坏矿山和铁路运输而造成生命损失。看来这几桩案件已使刑事诉讼达到了最后的高潮；但是仅在几个月以后，又发生了一场新的轰动事件。当时，红军中的八名将领因与准备入侵苏联的外国政府密使和间谍进行叛逆性联系而受到审讯，并被判处死刑。由于总是对流亡在外的列昂·托洛茨基抱有偏见，不断地说他是整个这一系列罪行的主要煽动者和指挥者，致使西方世界加深了不愉快的印象。可是又由于被告的自供，他们历次的交代已相互对证过，他们又坦白交代了他们如何迫于诱惑而笼统地加入他们起初并不了解其范围的那桩叛逆阴谋，以及他们后来如何发现自己已经身陷罗网而不可逃——加之从德日两国政府政治家无意间发表的言论中，还追溯到了某些进一步的确证，这便使得一九三七年一月审讯时在场的英美新闻记者深信，被告确实犯下了所控的阴谋叛国罪。仔细阅读了诉讼的全部报告和公审时的发言，也使我们现在的被告得出了同样的印象，虽然没有托洛茨基出庭，因而在判决书上缺少他本人应有的签押，并且关于他亲自参加这些阴谋的事，也提不出什么象在英国法庭上认为是证据的证词。……

如果我们对各个被告和审判他们的政府一视同仁，试图对这些诉讼作出一个不偏不倚的和带哲学性的评断（即对此事给予一个并非为哪一方辩护的假设性的解释），那么我们认为，这些诉讼是任何一次拖得太久而在最后赢得政权的革命斗争所必然遭遇的后果。整整一个世纪以来，相继几代的俄国革命者遭受沙皇警察的追捕，经常处于流放和监禁的危险之中，被拷打和处死，因此他们养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特别的‘行为方式’。他们的一生都在撒谎和使用化名，都在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甚至采取盗窃和暗杀手段。这些革命的阴谋家（我们在流亡生活中对他们几代人是亲闻亲见的），并不被认为是通常意义上的罪犯。即使他们在斗争中有过偷盗、行骗和谋杀的活动，也不能认定他们是盗窃犯、诈骗犯和谋杀犯。他们当中那些优秀的人，即使我们认为他们犯了错误，也

仍然是英雄的；虽然也有些人经不起诱惑而背叛了自己的同志，甚至成了沙皇的间谍和暗探。

至于那些已经身居高位而现在又关心‘维护革命’的人，在他们的行动中也可以追查到同这种行为方式类似的表现。他们对同事们的忠诚极不信任。尽管是合情合理的反对意见，也被他们看成是失败主义的表现和阴谋叛乱的苗头。知识分子当中一时流露出来的不满情绪，往往引起疑神疑鬼的警惕，弄得人们惶惶不可终日。集怀疑、猜忌、揭发、控诉和反革命斗争于大成，最终就激起了结构上的大动荡，如后来那些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阴谋和企图。……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一看那些俄国的阴谋家。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这十年中，他们因自己交代有从事反革命的图谋而被判罪。诸如此类的反革命图谋难道是不能逆料的吗？难道有哪一场取得伟大胜利的革命不曾对付过反革命的图谋？现已组成政府的斯大林集团，在其战胜饥荒和努力提高曾被公认为世界上最糟糕的农民的效率和文明方面，已经面临着各种巨大的困难。

为了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这整个十年中必然有人在政策方面提出一些诚恳而合理的不同意见。这些不同的观点是什么呢？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列举早期的一些争端，这就是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七年间，托洛茨基及其易变的集团持一种观点，而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又持另一种观点。

这些显然不曾中断过的一系列阴谋和反革命企图大概还要持续多长时间呢？唯一可能的回答是，只要那种行为方式存在，这种阵发性的企图就很可能持续下去。因为这些企图基本上都是由于那种行为方式产生的，而那些阴谋家一生又是按照这种行为方式的模子塑造出来的。正如经验表明的那样，这是一种终生的事情。只有等到那些在密谋反对沙皇的活动中度过其早年的现存一代都已死去后，苏联才能摆脱反革命的图谋，就象英国一七六〇年以后的情况那样，那时英国在一六四一至一七四五年一个世纪的叛乱平息之后已经经过了几代人。随着共产主义在苏联的不断成功，解决守着丰富资源过穷日子这个资本主义看来也无法解决的矛盾，

这些断断续续出现的图谋便会越来越软弱无力，而且必然会限制在初发状态，很快被新生一代的舆论扼杀在摇篮之中。但是在那些已经定了型的人中，那种行为方式是消失得很慢的，只有密谋反对尼古拉和斯托雷平的那些人都死光了，这种行为方式才能完全消失。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列宁给他的一个追随者写信说：‘怀疑、犹豫、阴谋、叛变等等还会长期地存在。’^①列宁的这个预见由于一九三七年莫斯科审讯的证据而被证实。……

一九三七年间，在许多加盟共和国内进行了另一系列的审讯，这可能同被广泛怀疑的那些叛逆阴谋完全无关。在这些审讯中，一些高级官员（主要但不全部是党员）被揭发犯有各种各样的渎职行为，其中包括私自侵吞和转移公共财产、靠纳税人的钱来进行无耻的挥霍与享受，有时在会计上采取伪造和隐瞒帐目的两套手法，以及各种各样应受处罚的失职行为，甚至受贿、包庇和故意破坏等。在一个目前人口已达一亿八千万的国家里，发生许多这样的案件，理应认为是难免的……无论在联邦共和国的企业或市级的企业中，还是在合作化运动和工会运动中，总之是在一个等于英国或法国人口四倍、或比美国人口多三分之一的共同体内，一年之中发生几百起行政上的舞弊案件，是不足为奇的。这种情况即使在上述这些国家里，也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¹³

约翰·斯特拉彻^②怀着同样的心情写道：

“我相信，未来的心理学研究者在回顾英国舆论界长期怀疑莫斯科的审讯时，将会把它当作一种最不可思议的……现象。”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560页。——译者

② 斯特拉彻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名记者，其政论虽多针砭当时的社会弊病，但并不希望作出重大的社会结构改变，而鼓吹一些次要的改革。——译者

他的传记作者接着记叙道：

“他后来继续驳斥了一些他认为是最难以置信的提法，即说这几次审讯中的被告之所以招供，是为了他们自己或妻子儿女的生命能得到饶恕；虽然这些的确是招供的主要原因。”¹⁴

相反的，自从一九五六年以来，一些著名的西方共产党人发表了明确的、有时是动人的声明，否认他们三十年代所作的证词。其中最主要的或许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作家恩斯特·费舍尔^①，他写了一篇感人而忠实的报道，叙述他在不知不觉间就成为他后来认识到的一桩司法谋害的共谋者。¹⁵

他发现自己的第二次审讯时正好坐在福伊希特万格的旁边，而此人不久就成了有关大清洗的所有出版物中最能拍马屁的作者。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小子，在他非常聪明而又讨人喜欢的脸上带有一种专注深思的表情。此人就是列昂·福伊希特万格。我以前没有见过他。他转向我说：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说：‘你是个非共产党人，看问题会比我公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过去我在西方，只能在远处观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审讯。我在报上看到的东两，似乎是很难使人相信的。人们简直不能相信那些事情。但是在这儿近距离内，在莫斯科的气氛中，就可

^① 作家费舍尔是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出任过议会议员。1950年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译者

以看到和听到一切了。……’

福伊希特万格沉思地继续说道：‘第一次审讯我至今想起来还象一出令人厌恶的戏剧。但是这次审讯……印象上使人感到是完全可信的。如果说它是伪造的，那我就不知道究竟什么是真实的了……’

‘如此说来，你相信那些供词……？’

‘是真的。我不可能有别的看法。公诉书还有怀疑的余地，但被告却让人信服了。你只要看看他们那种轻松的态度、无动于衷的感情、泰然自若的谈论就够了。如果这是一场化妆表演的话，那也需要好多年的排练；而且即使到了那时，也决不会象这次那样的自然。最为可信的是被告的举止、语调和态度。那是在公诉书中绝对不可能写进的。我敢说，我的很多朋友，如果他们光看公诉书的文本，就会感到这次审讯跟第一次审讯一样地令人厌恶；而我既亲自在场，因而知道这不是一种错觉。尽管有很多不太明确和令人费解的地方——但是要采取另一种看法，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福伊希特万格的想法虽没有解除我良知上的困惑，但那时我要采取另外一种看法也是不可思议的。说实话，现在我仍有这种感觉，虽然我们现在知道，那种不可思议的事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这时我反问自己，是否可以这样设想：苏联当时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它的经济落后于计划和需要，因而老一代的布尔什维克宁肯牺牲自己，代人受过，以便拯救一九一七年十月所取得、而现在处于危险中的胜利。这样的事情，我认为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些老布尔什维克肯定应该保持自己的尊严，不应谴责自己犯下最可耻的罪行，也不应大肆攻击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这样一来，就必须排除上述的另一种看法了。但是我并不认为、也不敢认为审讯是由斯大林教唆的，他才是杀害基洛夫的凶手，而且正是他应该对废黜、驱逐和消灭老布尔什维克，即几乎所有列宁的战友负责。对我来说，那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

如此广泛的一场争论在持续了四十年以后还余音未尽。这个从当代大量文献（其中有不少带倾向性的和不真实的报道）中选出的小小辑录就足以表明，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布哈林以及有关的案件只看成是苏联当局的私事。

遗憾的是，为了使反对布哈林的这个案件得以成立，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竟然花费了如此大量的精力，以致全世界对这件臭名昭著的事情也应负一定程度的责任。当然，苏联共产党人应当负责着手平反的工作。如果他们真能这样去做，那末其他人也就可能心安理得地由他们去处理问题了。可是，所有那些承担了一部分责任（哪怕责任很小）的人都应该认为，促使必要的重新甄审工作开一个头，是他们应尽的义务。

注 释

- 1 波立特：《粉碎叛徒是一次和平与社会主义的胜利》，载《国际出版通信》，1938年3月19日，第14期，第309页以及以后各页。1938年5月出版的一本英国共产党的小册子（R·佩奇·阿诺特和蒂姆·布克：《在莫斯科审讯中揭发出的法西斯间谍》）中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当然，蒂姆·布克是加拿大共产党的发言人。
- 2 主要参见卡特柯夫：《审讯布哈林》，伦敦巴斯福特出版社，1969年版；斯蒂芬·F·科恩的内容丰富的传记：《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伦敦怀尔德伍德出版社，1974年版。菲茨罗伊·麦克利恩曾参加过这次审讯，并作了亲眼所见的叙述，他也强调了这一点，见他的《东方的态度》一书，伦敦潘氏图书公司，1956年版，第55页以及以后各页。
- 3 《审讯记录报告》，第778页。
- 4 波立特上引书，第309页，第2栏。
- 5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352页。

- 6 载《共产国际》，1936年11—12月，第13卷，第10期，第641页。
- 7 M·埃考利：《审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的教训》，载《共产国际》，第13卷，第10期，第341—351页。
- 8 陶里亚蒂：《对九个问题的回答》，载C·赖特·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伦敦企鹅出版社1963年版，第372—373页。
- 9 例如他发表在《新闻纪事报》上的文章《莫斯科审讯是公平的》，重印在《今日苏联》小册子中，无日期（1936年？），以及他为达德利·科拉德的《审讯拉狄克等人中的苏联司法》一书所写的前言，左翼图书俱乐部（戈兰茨），1937年版。
- 10 见《D·N·普里特自传》第1卷，《从右翼到左翼》，伦敦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社，1965年版，第112页。普里特竟有脸继续说：“……西方勤奋的反苏宣传家们（指那些只是尽量为他们的报道寻找根据，而并不捏造报道的人），曾煞费苦心地研究过审判记录，认为他们已经在其中找出了有助于怀疑审讯的若干事实错误，并加以扩散。我和其他人后来自然研究了这些辩解，发现他们所指出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错，虽然它们看起来象是错误似的。”（第113页）
- 11 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卷：1948年）》，伦敦卡塞尔出版社版，第288—289页。
- 12 引自塞耶斯和康恩：《大阴谋》，纽约博奈和盖尔公司，第111页以及以后各页。应该提一下，这本书是苏联清洗工作的最令人讨厌的副产品。
- 13 同上引书，第926页以及以后各页。从诺尔曼·麦肯齐编辑、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通信集》中，可以更加充分地了解到韦伯夫妇支持清洗的意见（尤其参见第3卷）。为了全面探讨反映这次事件的令人感伤的著作，可参见大卫·考蒂：《同路人》，伦敦四人出版社，1977年版。
- 14 休·托马斯：《约翰·斯特拉彻》，艾尔·梅修恩出版社，1973年版，第164页。
- 15 见《一个反抗的人》，伦敦艾伦·莱恩企鹅出版社，1974年版，第304页以及以后各页。

第五章

进一步理解布哈林

人们对布哈林的评价并不总是这样低的。有机会与他平等相处过的一些外国社会主义者，对他的印象俨然不同：

“我是在一九一三年末至一九一四年初的那个冬天里，在维也纳的一次集会上第一次见到布哈林的。那时在俄国侨民区里，通常总要安排一些文学和政治方面的讲演，讨论会，甚至偶尔还有舞会。在这类集会上，总会看到好几张引人注目的面孔，甚至托洛茨基也偶尔参加这些集会。但是布哈林以其独特的人品，成了这些人当中最突出的一个。从外表上看，他的气派倒有些象圣徒，而不象造反者或思想家。这使我猛然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中那个米西金伯爵的形象，至少是俄国演员们在扮演这个角色时所力图塑造的那种形象。或许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一下子便察觉这位非凡人物具有的主要是人道主义者的方面。”

这就是德国共产党人罗莎·迈尔-勒文¹的看法。曾经任过巴勒斯坦共产党书记的约瑟夫·贝格尔用更加朴实的言辞描写他：

“如果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代革命家，托洛茨基代表第

二代，那么布哈林就属于第三代了，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才三十多岁。在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当中，他是一个经常同列宁意见不合并发生争论的委员。他们的意见相互补充，他们的分歧使思想领导生动活泼起来。但是他把自己看成是列宁的学生，并模仿他的风度，学习他坚决果断的气质，以及他表达自己思想时的那种干脆和极为平易的方式。把最复杂的政治和哲学概念归结为最简单的公式，这是列宁树立的风气。可是布哈林的思想却表达得不够鲜明，他不太能敏锐地注意到思想的实际含义，而过多地依靠风格的华丽。

后来对他提出追究时，才听说他过于教条主义。他写的书可以证实这种看法，但在与人交谈时，他还是热情、随和和通情达理的。他谈起话来海阔天空，而你可以感觉得出，他是在一面同你谈话，一面在考虑措辞。他对别人要说些什么很感兴趣。他让他的下级尽量发表意见，即使打算驳回他们的意见，也从不让它们感到受了冷落。他乐于同年轻人或学生们在一起。他们喜欢他，而他也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有一个时候这对斯大林是有用的，因为斯大林正是缺乏他那样吸引人的魅力）。”²

在动荡不安的革命时期，英国记者阿瑟·兰塞姆曾经常会见过很多革命领导人，因而能在特征上对他们作出清醒而自由的评价。一九一九年，他对当时的布哈林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布哈林，这位当年驻柏林经济使团的成员、布列斯特和约的激烈反对者、《真理报》的主编、有关经济和革命问题的多种著作的作者、不屈不挠的理论家，发现我正坐在‘大都会’的一张桌子旁喝茶。

我正好带着一本附有一幅世界地图的杂志，地图上把欧洲的

大部分地区染上了红色或粉红色，表示已实现和可能实现革命的地方。我把它递给布哈林说：‘难怪国外的人们说你们是新帝国主义者。’

布哈林接过地图，看了看。

‘白痴，十足的白痴！’他说。‘不过’他接着说道，‘我确实认为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革命的时期，也许这个革命要持续五十年，才能终于在全欧洲、最后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当时，我有一套现成的理论，往往拿来对付各种各样的革命者，几乎都能取得满意的效果。我想用它来试一试布哈林，于是说道：

‘你们大家总是说，在英国将发生革命。英国是一个工厂而不是一个粮仓，因此一旦爆发革命，我们就马上会被切断全部粮食供应。难道你们没有想到过这一点？根据你们自己的理论，英国资本一定会和美国联合起来，使得革命在六个星期内就会没有东西吃。英国不是一个象俄国那样的国家，在俄国，你们只要走到有粮食的地方就能够设法养活自己。但是在英国，六个星期就会看到饥荒和体力下降。我倾向于认为，英国革命将对俄国有害无益。’

布哈林笑了笑，说道：‘你是一个老反革命！你说的可能完全正确，但是必须看远一点。你只在一点上是正确的。如果革命遍及欧洲，美国是会断绝粮食供应的。但是到了那时，我们可以从西伯利亚得到粮食。’

‘那条运输能力很差的西伯利亚铁路能为俄国、德国和英国提供粮食吗？’

‘还等不到那时，毕盛^①和他的朋友们就会下台，法国也就会供养我们。可是你决不能忘记，还有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粮田。一旦内战在欧洲结束，欧洲就能养活自己。靠英国和德国的技术援助，我们就能很快把俄国变成一个有效的粮食基地，供应欧洲大陆

① 毕盛，1917年任法国外交部长期间，竭力推行消灭苏维埃国家并使法国称霸欧洲的政策。——译者

的所有工人共和国。但是即使到那时，这个任务也只是才开个头。一旦英国发生革命，英国的殖民地就会力图投入美国的怀抱。接着，就该轮到美国；而最后，我们很可能必须一致联合起来，去推翻资本主义在南非某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内的最后堡垒了。’他那双明亮的小眼睛似乎透过阴暗餐厅的四壁向远方看去，接着说道：‘我完全能够设想，欧洲的工人共和国也许都必须有一个倒转过来的殖民政策。正如你们现在为了剥削落后民族而去征服他们一样，你们将来也可能为了取得剥削手段而去征服殖民者。我耽心的只有一件事。’

‘什么事？’

‘我有时耽心，这场斗争如此残酷，拖的时间又如此之久，以致欧洲文化全部会毁于铁蹄之下。’……我默默地喝完了最后一口茶。布哈林海阔天空地谈了上面那些宏伟的远景以后，一口喝完了我给他加了糖精的极甜的茶（这使我想起了他在夏天生病时，拉狄克跑遍全城为他找糖果治病而不用其他药的事），接着他就匆匆离去，一边走一边扣他的衣服（象一个古怪的革命的小德·昆西^①），并且用惯常那种连走带跑的步态，走到这间光线朦胧而香烟弥漫的餐厅另一头，消失在幽暗之中。”³

不久，他的这种热情就消退了，而革命正面临着更加暗淡的前景。布哈林明显地担心“欧洲文化”将在新的苏联衰落下去。他越来越经常地被迫来保卫言论自由，以反对他的同志们的攻击。

娜捷日达·曼捷尔斯塔姆在她生动的回忆录中，追述了一九二二年布哈林由于听到她丈夫同一个契卡人员不愉快的

^① 德·昆西是十九世纪前半期的英国作家，性情古怪，放荡不羁，以《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而著名。——译者

会见而勃然大怒（当时那个契卡人员正在审讯她丈夫的弟弟）。根据她的记述，布哈林曾出面干预此事，因而促成了这位受害者的释放，虽然她觉得，布哈林当时的愤怒可能是针对办事不力，而不是对恐怖手段表示愤慨。但是，从她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出，由于斯大林的权力得到了巩固，当时的气氛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他写道：布哈林

“一向是个性情急躁、易动肝火的人，但是他发泄愤怒的方式却随着时代而改变。一九二八年以前，他总是高声骂着：‘白痴！’然后拿起了电话；但到一九三〇年以后，他只是皱起眉头说：‘我们得想一想同谁交涉去。’”³（此处注码在原书中与前一注码重复，章末也缺注文。——译者）

尽管布哈林不得不小心谨慎，但曼捷尔斯塔姆的这位忠诚的遗孀从未怀疑布哈林是始终赞赏他在她丈夫身上发现的美德的。当她猜想她丈夫已经死去的时候，便打电话向布哈林抱怨迟迟不出版她丈夫那些难忘的诗篇。

结果，远在布哈林本人的著作还未考虑出版之前，曼捷尔斯塔姆的大量作品便在苏联现代的出版社出版了。就是对那些身在苏联境外的人来说，娜捷日达这部内容广泛的作品所提供的史料也仍然足以表明，布哈林是一个厚道的人。他在很多方面还表现出是个富于同情心的人，在大量侨民的著作中，就有许多关于他彬彬有礼的事例。

这也反映在他的政治影响中。列宁毕竟在自己的“遗嘱”里把他描述为“全党所喜欢的人物”，即使因为他不善于掌握

辩证法而对他提出导师般的告诫，但同时还表扬他为“党的最杰出和最宝贵的理论家”。从列宁那里得到一个“良”的评价，也比大多数人得到的多得多；而人们也许还记得，在这同一份文件里，斯大林得到的评价却是个毫不含糊的“劣”字。⁴

一九二七年，格朗那特百科辞书刊载了一系列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自传，在布哈林撰写的自传里也可以看得出他那种感人的热情：

“我大约五岁的时候，父亲就被任命为比萨拉比亚的税务稽查员。我们在那里住了四年左右。从精神生活方面来说，这个时期是我一生中最贫乏的时期。没有书看，而当地虽有迷人之处，却带有典型的外省城镇的一般气氛。我弟弟和我当时简直没有受到什么系统的教育，在户外度过了我们的大部分时间。我们是在园子和田野里长大的，对袋蜘蛛在园子里的每一个洞穴了如指掌，经常捕捉人面蛾和地松鼠，等等。那时，我最大的梦想是得到德夫林的《欧洲和中亚地区蝴蝶图谱》和他的其他同类著作。后来我们搬回了莫斯科，我父亲连续两年没有工作。我们生活非常贫困。我经常捡一些骨头和瓶子去卖两三个戈比，把旧报纸带到拐角处的商店去换半个戈比。就在这时，我进了市立小学二年级。

虽然我父亲生活非常放荡，但是他在俄国文学方面有着渊博的知识；在外国作家中，他最尊重海涅。那时候，我简直是什么书都看。我能背诵海涅的一些诗篇，并默记科兹马·普鲁特科夫的全部格言^①。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就读了一切古典著作。”⁵

就在这篇简短的自传中，布哈林还写道：

^① 科兹马·普鲁特科夫是热姆楚日尼科夫兄弟和阿列克舍·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三人共用的集体笔名。他们的格言集《深思的成果》中的许多格言，后来被人们当作了谚语。——译者

“在我政治生涯的最重要的一些阶段里，我认为必须提一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期。那时，我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头子，在政治上犯了一次极大的错误。在这以后整个时期的特点是，列宁对我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就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而论，我受惠于他的比受惠于任何人的都要多。的确，我感到很幸运的是，不仅跟他站在相同的一边，而且无论作为他的同志或是他的部属，都同他很接近。”⁶

很清楚，布哈林对列宁的忠诚是完全真实可信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有趣的证据。一九三〇年间，布哈林被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派往国外去商谈购买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的问题。那些档案中有卡尔·马克思本人所写的和有关他的大量文献，希特勒上台后，迫使这些档案及其原主们流亡到国外。布哈林同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院长阿多拉茨基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阿罗舍夫一起来到巴黎，出一千万法郎购买这批资料。

负责这批档案的是著名的孟什维克学者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他的兄弟就是布哈林的亲密同事和知己李可夫的妹夫。他们见过几次面以后，尼古拉耶夫斯基写了一本半虚构的札记，叙述了布哈林的一些私下议论和一位法国共产主义活动家提供的若干情况，出版时以《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纪事》为名。若干年后，这本书再版时，正当对布哈林进行缺席审判的间歇期间，作者曾对写这本纪事时的历史背景作了一次长时间的答记者问，直接报道了布哈林在他们私下谈话期间所说的话。这些话与了解布哈林对列宁的态度极其有关。

他对列宁的谈论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他非常忠于列宁，即使当他谈到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时……他也总是带着热情而友好的语调。

下面就是他告诉我的关于列宁生病的最后时期情况。从布哈林叙述的各种细节来看，我猜想他指的是一九二二年初秋。他说：“列宁想叫我去看他。医生不让他讲话，怕引起他心绪不宁。但是当我到他跟前时，他立刻就拉住我的手，把我带到花园里去。他开头就说：‘他们不让我考虑这个问题，说这会使我太操心了。但是他们为什么不理解，我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呢？如果不让我谈这个问题，我会比谈出来更不痛快。我能同你这样的人谈谈这些问题，心里就踏实了。’”

我问布哈林那次谈了些什么。他回答说，他和列宁主要谈的是我们所谓的“领导继承”问题，也就是接班人的问题，看谁在列宁死后适于担任党的领袖。布哈林说：“这是列宁最担忧和最操心的问题。”

在这方面，他还告诉我说，列宁最后几篇文章，如《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以及关于合作制等等的文章，只是列宁已经计划写作的一部分。他还想发表另外一系列几乎同样数量的文章，全面描述将来必须采取的政策。这就是他的主要目的。

列宁的遗言包括两个部分：小部分是关于一些领导人的问题，大部分是关于政策问题。我问布哈林，列宁政策的原则是什么。他对我说：“关于这一政策，我已写了两篇东西：《走向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和《列宁的政治遗嘱》。第一篇是一本小册子，已于一九二五年出版，第二篇也于一九二九年出版了。”布哈林问我：“你记得那些小册子吗？”我答道：“我承认我现在不记得《走向社会主义之路》了。”

他说：“那是一本很有意思的小册子。在我写它的时候，我把我和列宁关于已经出版和尚未出版的文章的谈话纳入其中。我试图在那本小册子里只保留列宁所想过和告诉过我的东西。当然，我并不是纯粹引用列宁的原话，而是把我所理解的他的意思在我

所写的东西中反映出来。但是，列宁对我谈得很多，我只能把他的思想提纲挈领地概括起来。他的遗言的主要之点是：不必对农民加以更多的强制，也能够达到社会主义。”当然，这涉及到如何对待占全俄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问题。按照列宁和所有一般的共产党人的意见，在一定时期内，可能要对农民实行强制，但是终归不能作为长久的对策。这就是《走向社会主义之路》一书的要点。

至于《列宁的政治遗嘱》，布哈林说，情况就不同了。“这个问题已引起很大的争论，我只能把列宁已经发表的意见写出来。这本书基本上讲的是同一个问题，但是第一本小册子讲得更深入，其中的思想也讲得更透彻，并不限于列宁已经写过的。”⁷

布哈林对列宁所定政策作的逻辑上的引伸实际上是否站得住脚，这在学者中间仍然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在这里没有必要卷入这场争论，因为用不着把尼古拉耶夫斯基所报道的话看成是对苏联经济论战所作的定论。但是，他的报道确实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说明布哈林当时的思想状况，以及他忠实于他认为是列宁托付给他的事情。

但是，布哈林在对他进行审讯的这场恶梦还刚开始酝酿的时候，就听到风声说，他将在阴谋害死列宁这一恶意捏造的罪名下受到控诉。这显然是公诉书里所有罪状中最使他伤心的一条，而今天看来，这份公诉书十足是一份巫婆调制的大杂烩。

刑期是那样地紧迫，以致布哈林来不及用书面文字记录下他对这种乌烟瘴气的反应。他草拟了一封“致未来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信，并要求他的妻子拉林娜熟记心中。她反复背诵了这封信，直到一字不差地记了下来。布哈林死后，她遭

到逮捕，就把它装在脑子里带进了监狱。她一经获释，便把这封信写了出来，寄给了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这封信还不够强烈，以致感动不了那个冷漠无情的机构成员。

“我命在旦夕。我低下我的头，但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面前，因为它必定是无情的，但也是纯洁的。面对着一部凶恶的国家机器，我感到无能为力。这部机器大概借助于中世纪的方法，攫取了巨大的权力，捏造着有组织的谰言，厚颜无耻地在采取行动。

捷尔任斯基已不在世，契卡的优良传统随着岁月而黯然消失了。当时，革命思想指导着契卡的全部活动，对待敌人严酷是有道理的，它捍卫国家不受任何反革命的危害。正因为如此，契卡赢得了特殊的信任和格外的尊敬，树立了威望与信誉。而现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大多数的所谓机构，已蜕化成为官僚主义的组织，没有思想、腐败无能而又待遇优厚。它们借助契卡以往的威信，迎合斯大林因争夺地位和名誉而产生的病态的狐疑心理（我这么说并不为过），制造他们那些卑鄙的案件，而没有意识到，他们同时也在毁灭自己，因为历史是不会容忍罪恶行径的连署人的。

这些“创造奇迹的机关”能够把任何一个中央委员、任何一个党员干掉，把他们指为叛徒、恐怖分子、异端分子和间谍。假若斯大林怀疑到他自己的话，马上也会有证据提出来加以证实的。

暴风雨的乌云已经笼罩着党。我这颗脑袋，这颗无辜的脑袋，会招致成千上万无罪者人头落地。这是因为必须捏造出一个组织，一个布哈林派的组织，而这个组织事实上不仅现在不存在，因为我同党没有丝毫分歧已经第七个年头了；而且过去在右翼反对派的年月里，它也是不存在的。关于柳京和乌格拉诺夫的秘密组织，我一无所知。我已经同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一起公开地阐述过我的观点。

我十八岁就入了党。我终生的目的，始终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这些天来，冠以“真理”这个神圣名

字的报纸在刊登着最肮脏的谎言,说什么,我,尼古拉·布哈林,想摧毁十月革命的胜利,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从未见过的蛮横行为,是一个弥天大谎,其对人民的蛮横和不负责任,只能用这样一个谎言才能相比,即说有人发现,尼古拉·罗曼诺夫(即沙皇尼古拉二世——译者)竟一辈子献身于反对资本主义和君主政体的斗争,为完成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如果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问题上,我曾不止一次地犯过错误,那就让后人对我作出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样严厉的评判吧。我们是第一次沿着一条尚未开辟出来的道路走向一个单一的目标的。凡事各有其时。《真理报》也曾开辟过一个讨论版,让人人都来进行辩论,探求道路和方法,争论一番,得出决定,然后一起前进。

我向你们未来一代的党领导人呼吁,在你们的历史使命中还应包括这一项义务:驱散滔天罪恶的乌云,它在这些恐怖的日子里越来越嚣张,象火焰一样越烧越旺,以致窒息着党的生命。

我向全体党员申诉!在这些日子里,在或许是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确信,历史的过滤器迟早必然会清除掉我头上的污秽。我从来不是叛徒;我会毫不迟疑地献出我的生命来换回列宁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我没有干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我要求年轻而正直的新一代党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信,替我平反昭雪,恢复我的党籍。

同志们,要知道,在你们举着向共产主义胜利迈进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

尼·布哈林⁷⁸

拉林一九七八年呼吁书中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从这封信里引用的。

注 释

- 1 这段回忆引自塔巴克编辑的《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艾伦·莱恩企鹅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 2 见《一代人的毁灭》，哈维尔，1971年版，第99—100页。这本书中有对布哈林干预一九三四年作家代表大会的生动描写，其中有些细节成了目前有独立见解的苏联学者争论的话题。
- 3 见《一线希望》，柯林斯，1971年版，第114页以及以后各页。
- 4 “在我看来，布哈林和皮达可夫……是最卓越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列宁只是在指出这一点以后，才怀疑布哈林是否“完全了解”辩证法。相反，说斯大林“太粗暴……我建议……想个办法把斯大林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所引列宁语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617—618页。——译者）
- 5 参见乔治斯·豪普特和让-雅克·玛丽：《俄国革命的制造者》，艾伦和昂温出版社，1974年版。
- 6 同上书，第34页。
- 7 尼古拉耶夫斯基：《权力和苏联权贵》，安·阿博尔出版社，1975年版，第11—13页。
- 8 这封信引自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一书，第183—184页。如果说有一本介绍这个案件整个背景的必不可少的书，那么就是这本书。除了别的事情以外，这本书还指出，在这封感人的信件中，布哈林的推想有若干错误之处。

第六章

是布哈林宪法吗？

在一九三五年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莫洛托夫提议对选举进行彻底的改革，即废除公开（当众）表决，实行无记名投票，对选民资格一视同仁，使全体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过渡到直接选举。这次代表大会因而批准成立宪法委员会，其成员由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宪法委员会立即开始工作。斯大林被指定为主席，并任命了总共三十一名委员。其中包括七个加盟共和国的主席，以及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李维诺夫、拉狄克、布哈林和雅柯夫列夫。最后三个人在大清洗时被杀害了，尽管他们后来起草的宪法提出了“人身不受侵犯”的保证。

官方出版的斯大林传记写道：这个宪法委员会起草的宪法草案

“经过了五个半月之久的全民讨论。在我们国家里，没有那个角落的劳动者不曾研究和讨论这个人类史上最重大的文件。苏联全国人民都欣喜万分，深为自豪地欢迎和赞同了宪法草案。”¹

就是这本传记，据赫鲁晓夫后来告诉我们，是由一个委员会写作的，但却是一个人定的调（他觉得在表扬斯大林方面有

必要增加一点丰富的调料)2。这本传记继续写道：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新宪法由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采纳了。苏联各族人民为了表彰新宪法的作者，一致把这个宪法称为斯大林宪法。”³

虽然看来可以完全相信，这最后一句话确实是斯大林本人写的；但是事情很清楚，一九三六年的苏联宪法却恰恰不出于斯大林的手笔。罗伊·麦德维杰夫在真正的作者中，具体地提出了布哈林和雅柯夫列夫⁴。尼古拉耶夫斯基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件轶闻，如果它是真实的话，那就使我们感到一个确实令人心迷的矛盾：

“各种迹象已经清楚表明，布哈林在起草宪法中起过主要的作用。他是制定宪法草案的那个委员会的书记。早在一九三〇年，他就提出了一个普选法的草案，并为消灭共产党的一切特权而斗争，这两点都在这部宪法中得到了反映。此外，他对我谈到高尔基、巴甫洛夫等人时，给我的印象是，这一宪法的思想倒是这些人最早提出来的。

后来有一天，当我们正在讨论‘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时候，布哈林从衣袋里掏出他的自来水笔，递给我看。他说：‘仔细瞧瞧，整个苏联新宪法从头到尾都是用它写成的。我独立承担了这项工作，只有喀留沙（即拉狄克）帮了一点忙。我能够来巴黎，只是因为我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所有重要的决定都已经加以采纳了。现在他们正在排印宪法的文本。在这部宪法中，人民将更有地位。他们再也不能被撇在一边了！’

布哈林为这部宪法感到非常骄傲。不仅是因为它写进了普遍

和平等的选举权，而且因为它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总之，它是把这个国家从一党专政和平过渡到真正人民民主的一个深思熟虑的方案。布哈林说，起草宪法的委员会甚至提出了在选举时有几个候选人同时竞选的问题。”⁵

韦伯夫妇在他们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书中，以真正的颂词祝贺了这部宪法。他们拿这部宪法与一七七六年的人权宣言和一七九三年的法国革命宣言相比，大大贬低了那两个宣言，因为不象莫斯科考虑周到的功利主义者那样，美国和法国的伟大奠基人只提人的权利而忽略了“人的义务”。这些义务却相当充分地列入了苏联宪法中。不过还很难完全肯定，这是否会受到《哥达纲领批判》作者的欢迎。但是不管布哈林的意图如何，事实仍然是：他的宪法（如果的确是他的）却显然不足以保证他本人有免遭任意逮捕的自由，更谈不上保证在他倒台后那场血雨腥风中被杀的成千上万的人有免遭侵犯的自由。

尽管如此，布哈林留下的这份遗产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自从一九五六年以来，对苏联权势集团提出批评的整个新一代人的呼声，并不是要“推倒这部宪法”，而是要“实施这部宪法”。在这部出色的宪法下，“通信秘密受到法律保护”；言论、结社和示威的自由也是如此。正是由于日益掀起了对不执行和违反一九三六年宪法中这些条款的大论战，苏联现政府才发动了对一九七七年新宪法的讨论。新修订的宪法几乎不加改动地把旧宪法中许多布哈林的重要主张归纳了进去。这里不去讨论这两个版本之间所作改动的意义。但是，至少指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一番话是适宜的，他在一九七七年

宪法草案递交最高苏维埃批准时说道：

“对某些条文总共提出了大约四十万条修改建议，目的是为了精确表述、改进和补充草案中的提法。宪法委员会认真研究了这些修改意见（当然其中有许多是重复的），因而建议对草案中的一百一十条进行修改，并增加一条新的条文。”⁶

即使有些建议是重复的，但要把四十万条修改建议归结到总的一百一十条条文中去，也是一个极为艰巨的综合过程；而如果能看到完成这项任务中的充分而自由的争论，那将是十分有趣的事情。遗憾的是，对局外人来说，整个过程好象是严密控制和操纵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合勃列日涅夫先生所说的：

“全体苏联人民实际上成了自己国家根本法的真正创造者。”⁷

如果对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宪法进行一场认真的讨论，实际上必然会产生公众的激烈争论，但在这次经过特别组织的讨论中却一点儿也看不出这种争论来。当然，谁也不用怀疑，曾经“为此目的召开了四十五万多次党的公开会议”，也不用怀疑“会上有三百多万人发了言”。这些统计数字可能使韦伯夫妇深受感动，而他们也定然会赞赏这些统计数字所显示的那种表面上的全民意见一致吧。

然而，我们有一个更能感人的统计。有那么一个人，他肯定至少是这部即将出笼的宪法的撰写人之一，很可能还是主

要的撰写者，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撰写者；而这个人至今仍然是如梦魇一般的官方阴谋的牺牲品，这种阴谋使他直到被枪决前，一直承担着最污辱人和最贬低人的诽谤。这个数字的意义是：一人死亡，但却使苏联过去和现在的宪法笼罩了阴影，除非苏联人能够找到一种办法，让这件事的真象大白于世。诚然，需要昭雪的还有一大批其他的受害者，但这个人却特别需要昭雪。在一个甚至不能为其宪法的撰写者伸张正义的国家里，法律又怎么能行得通呢？

注 释：

- 1 格·费·亚历山大罗夫等：《约瑟夫·斯大林传略》，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社，1949年版，第132页。如果有人肯下功夫，人类历史可能会提供也许一部或者两部比这更进一步的作品，使我们大多数人乐于将它们归入并不次于这本作品之列。
- 2 尼·谢·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发言人”出版社，1976年版，第67页以及以后各页。
- 3 亚历山大罗夫上引书第134页。
- 4 《让历史来审判》，第512页。
- 5 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权力和苏联权贵》，安·阿博尔出版社，第22页。
- 6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1977年10月4日）》，莫斯科《国际生活》月刊，第4页。
- 7 同上。

第七章

要求平反

罗素基金会接到尤里·拉林的呼吁书时，我们知道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杰出的战士已经对他父亲的案件表示不安了。法国共产党历史学家让·艾伦斯坦在他的《斯大林现象》一书中，对莫斯科的几次审讯作了相反的评价，这本书已在法国左派当中广泛地传播。保罗·斯普里亚诺在他写的《意大利共产党史》（此书实际上是正式的意大利共产党史）第三卷中，也猛烈地抨击了这几次审讯。圣地亚哥·卡里略在《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中，尖锐地评价了斯大林主义对苏维埃制度的各种影响。由于政治敏感度有所不同，英国共产党人只是在一九七八年三月，才在其月刊《今日马克思主义》上特地发表了一篇纪念布哈林的专栏文章。其中写道：

“上个月（三月）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日。布哈林生于一八八八年，一九〇六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他是一位理论家和组织家，于一九一七年七月被选进党中央委员会，十至十一月间成为莫斯科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他被任命为《真理报》编辑，并一直任职到一九二九年。在二十年代中期的一个短时期内，即在列宁逝世以后和斯大林尚未独揽大权以前，布哈林就达到了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权威的顶点。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间，他还领导过共产国际。在一九三七年他被捕前的三十多年里，他一直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人物之一……”

在回顾了布哈林判处死刑的情况后，文章继续写道：

“一九五五年以来对斯大林时期司法程序中普遍存在非法行为的大量揭发，使人们对这次裁决产生了怀疑。但是要说他的案件已被重新提了出来，那就未免言过其实了；而按苏联的说法，布哈林大体上仍然是一个‘被排除在考虑之外的人’。可是，比起很多已被镇压而后来得到昭雪的人来，他的罪行更加缺少证据，何况六十年代初期，几位历史学家和政治人物都曾经直言无讳地谈到布哈林的无辜。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布哈林的作用和重要性似乎一直被别人遮住了。尽管他在国内战争期间和结束时与左派共产主义者有过短暂的牵连，却从未象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那样成为主要的派别领导人。相反，他多年来一直是全党的一个领导人。在他和官方的态度发生分歧时，他总是在中央委员会内部提出他的反对意见，避免造成托洛茨基那种从外部批评所产生的影响。和斯大林相比，他并不是把他的政治主张建立在斗争性、突击队和庞大计划的基础上，而是自下而上地逐步组织对苏维埃文化的改革。他的很多思想跟葛兰西相同。”¹

虽然这些人士的声明是有价值的，但都不是对拉林呼吁的直接反应。他们没有必要去充分施加各自党的政治影响，也不是直接向苏联当局进行呼吁，而苏联当局却是唯一有权力给拉林一家以少得可怜的补偿的。

在经过商量以后，因此我们决定散发拉林致贝林格的信供世人参考，并且请求各社会党和共产党中我们知道的广大

知名人士，都来签署一份给勃列日涅夫先生的呼吁书。由于我们的目的不是对贝林格先生“增加压力”，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要求所有的收信人保守秘密，直到意大利共产党人有机会作出自己的反应。虽然我们只给几十个人写了信，但却得到社会主义运动中广大人士的支持，在接到这份呼吁书的很多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泄露秘密。

意大利共产党人作出的反应是引人注目而又毫不含糊的。在六月十六日(星期五)，党报《团结报》发表了保罗·斯普里亚诺(他早已独自签署了这份呼吁书)的长篇声明，我们已把它作为附录收在这本小册子中(见附录二)。这篇声明是以责令的口气开头的：

“要求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位杰出代表和三十年代审讯的其他受害者伸张正义，不仅涉及他们的历史功过问题，而且也是出于道德上和政治上的需要。”

一个星期以后，拉林这封信的全文在独立的报纸《共和国报》上发表了²，另外附有一篇斯普里亚诺措辞强硬的答记者问(见附录三)，以及意大利共产党文化事务方面主要官方发言人阿尔多·托尔托雷拉的一份声明。随后，该党的学术周刊《再生》也刊载了一篇长文。³与此同时，在呼吁书上签名的纷至沓来，其中有：法国共产党人阿尔蒂塞尔和巴利巴尔，法国社会党国际书记罗贝尔·蓬狄戎，激进的法国统一社会党人克洛德·布尔代，以及西蒙娜·德·博瓦尔；希腊共产党书记(原书缺人名——译者)；西班牙历史学家克劳丁；第四国际

领导人埃内斯特·曼德尔；美国的诺姆·乔姆斯基，科利斯·拉蒙特，约·汉森，以及写有布哈林传记的斯蒂芬·科恩；澳大利亚共产党则寄来了一封表示完全赞同的热情的信；此外还有老资格的比利时共产党领导人皮埃尔·儒瓦。

在英国，不少工党议员和该党执行委员会的几名委员签署了呼吁书。工党的《劳动周刊》有一篇充分的报道：

“为斯大林大清洗中一位死去甚久的受害者已经发起了一场世界性的运动。

工党议员们与十五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敦促苏联为尼古拉·布哈林恢复名誉，他是继列宁之后的克里姆林宫主要理论家，一九三八年有一次橱窗式审讯以后被枪决……

在英国，支持这个运动的有工党主席琼·莱斯托和七名工党议员：伊恩·米卡多、诺尔曼·巴肯、杰弗·埃奇、马丁·弗兰纳里、埃里克·赫弗、斯坦·纽恩斯和奥德里·怀斯。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特雷弗·格里菲思和霍华德·布伦顿，以及贝特朗·罗素和平基金会的一些成员（基金会是为了协调英国呼吁书的）也参加了签名的行列。

他们要求苏联‘充分说明造成布哈林冤案的情况……’

利物浦的沃尔顿下院议员埃里克·赫弗签署了这份呼吁书以后说：‘对他的指控无疑是斯大林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苏联想返回到只是在革命后短暂时期内实行过的民主统治方式，那么就必须承认他们的政策是根本错误的，必须全盘加以否定。

‘布哈林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领袖和早期的布尔什维克之一，是一个才智超群的人。’”⁴

我们发现，安迪·麦克史密斯已经根据布哈林审讯写了

一个剧本，并预定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在皇家剧院首次上演。剧本作者和剧院都一致表示赞助这个运动。我们还获悉，在筹备一次关于布哈林著作的学术讨论会，所以我们决定继续征集对这份呼吁书的更多的签名，直到这次讨论会举行为止。

同时，第一批签名已经送给了苏联当局，我们等待着他们的答复。

注 释

- 1 《编辑部评论》，第 99—100 页。
- 2 见《共和国报》，1978 年 6 月 22 日，第 12 版。
- 3 古伊利亚诺·普罗卡西：《对我们过去的清算》，载《再生》周刊，1978 年 6 月 30 日，第 26 期，第 23—24 页。
- 4 哈罗德·弗雷曼：《为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呼吁》，载《劳工周刊》，1978 年 6 月 30 日。

附录一

老布尔什维克的呼吁书

在苏共二十二大后，四位老党员积极分子¹给政治局写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即政治局）的同志们，

我们向您们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延续了三十多年的道路是复杂的。在这条道路上，他犯过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严重错误，曾经不止一次地受到列宁的批评。但是，列宁对布哈林所犯错误的批评，决不意味着怀疑他对党和革命的忠诚，而是跟一个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本问题上**有共同观点的人**相互之间展开的批评和争论。

人们都注意到，布哈林一向是能够承认错误并毫无虚荣心地加以改正的。正是因为这样，在列宁时代并未因其错误而把他开除出党；他一直是政治局的委员，并任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主编十二年。

列宁在其遗嘱中估计了过去的一切，仿佛是给某些党的工作者以最后鉴定，他称布哈林为‘**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

一九三七年开除布哈林党籍和撤销其党中央的职务，仅仅是根据‘调查’中被指控的间谍和恐怖活动的证言，这些证言的荒谬性，现在已是尽人皆知的了。苏共中央委员彼·波斯别洛夫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全苏历史学家会议上毫不含糊地宣布过（它已在报刊上发表），布哈林不是恐怖分子或间谍。那么，在两千人的

大会上和在报刊上已经作了如此肯定的宣告之后，何以在缺乏犯罪事实的情况下仍保留着法院的判决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呢？

这是有损于法院的威信的。他被判罪和开除党籍，并不是因为在布勒斯特和约问题上犯了错误，也不是因为在集体化问题上持不同意见。

撤销非法判决和恢复布哈林的党籍，将不仅是为列宁时代我党一位杰出领袖个人伸张正义，而且在进一步阐述这一时期党史的问题上也将起重大作用。现在正是由于对布哈林的名字有所禁忌，在阐述党史上便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只要一提到布哈林，就只能朝坏处写，从而导致对这部分历史的歪曲。

我们认为，恢复本案的真象和撤销根据伪证而作出的决议，将会更进一步提高我党的威信和我国的声望。

我们亲知布哈林在我党光荣历史的许多阶段中的表现，包括他作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缺点和优点。因此我们完全领会和同意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仿佛向党告别时说的如此热情的话。在这一遗言中，他唯独把尼古拉·布哈林称为‘全党所喜欢的人物’。

我们对列宁的这句话有高度的责任感，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们——党的主席团成员们，不要让一个受到列宁如此好评的人的名字仍列在叛徒营垒中，而要撤销对布哈林的判决，并恢复他的党籍，从而为他一九三七年遭到的指控昭雪。

被列宁誉为‘全党所喜欢的人物’的人，是不能留在叛徒和被党抛弃者的名单内的。”

在这封信上面签名的四名老布尔什维克都已去世了，但是他们的要求却仍然没有得到答复。

注 释

- 1 他们是：叶·斯塔索娃，1898年入党；维·卡尔宾斯基，1898年入党；鲁·卡塔尼扬，1903年入党；A·鲁金科，1905年入党。这封信引自罗伊·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一书。

附录二

保罗·斯普里亚诺的 《布哈林案件》一文

要求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位杰出代表和三十年代审讯的其他受害者伸张正义，不仅涉及他们的历史功过问题，而且也是出于道德上和政治上的需要。

被列宁誉为党的宠儿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惨死已经四十年了。《团结报》在去年三月二十六日刊登了朱塞普·博伐写的长篇文章，赞扬了布哈林的人品和经历，以及他的宝贵思想。

但是，苏共二十大以后已过了二十二年，苏联国内对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莫斯科审讯中被指控和判罪的布哈林和其他主要领导人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还一直保持沉默。这个问题仍然是我们所关心的。

布哈林的遗孀和他被枪决时刚刚出世的儿子尤里·拉林（布哈林），都在集中营里度过了多年的岁月，并且自他们获释以后，都一再请求过苏联当局和苏共领导恢复他们亲人的名誉。支持这一行动的呼吁书，也在一九六一年由几位老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曾当过列宁的秘书和共产国际的一任书记的斯塔索娃同志）提出。看起来，一九六一年苏共二十大以

后,苏联领导人对于揭露斯大林主义的镇压措施,似乎比以前在二十大时更明确得多了(即认为不仅镇压了党政军领导人,而且还镇压了群众)。那末,布哈林本人似乎可以列入那些审讯中的第一个主要受害者,他的名誉也可以正式恢复,从而推翻一九三八年给他罗织的充当外国谍报机关间谍,出卖祖国,甚至阴谋杀害列宁等荒诞无稽的罪名。这些罪名除了是恶毒的,还显然是捏造的,从未有被告的任何供词使其确立;被告只是为了免于连累家庭,才承认对一桩“复合”的阴谋负有责任。但是,到一九六四年,这个可能的希望还没有完全展现,很快就又被坚决地堵死了。现在,在布哈林逝世四十周年的时候,他的儿子又提出了呼吁,而贝特朗·罗素和平基金会已接受了这个吁请。

我们不能忽视这件事。意大利共产党的学者们、党的一些领导机构及其党员,从一九五六年起直到今天,已经毫无保留地对苏联历史上和国际共运史上的某些事件进行了评判,并已弄明白一些不正常的司法调查、审讯、判决和镇压事件的真相。我们已经研究了布哈林的作用。不仅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而且在为了建设新社会而必须采取的抉择和政治决定的热烈讨论中,都把它作为一个最有意思的问题来加以探讨。这样做,过去不是、现在也肯定不是要把布哈林的贡献加以理想化,而事实上是象列宁和葛兰西在他们的时代所做的那样,热情地讨论布哈林的理论和经济思想,从整体上评价布哈林在苏联历史各关键时期所起的实际作用,包括从十月革命前的那些日子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订立,从制定新经济政策到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年与斯大林共同反

对左翼反对派的斗争，从对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发生重大的争论直到斯大林独揽党政大权前内部斗争中引人注目的倾轧。

朱塞普·博伐、埃尔内斯托·拉焦涅里、古伊利亚诺·普罗卡西等同志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和调查，都是为了探讨这些问题。

很显然，提出布哈林的贡献问题，决不仅仅出于道义上恢复名誉的必要性（虽然这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因为恢复名誉的必要性，对那几次审讯的其他受害者，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拉狄克、李可夫等很多人也是正当的；他们蒙受了诽谤性的罪名，并被判以立即处决或在监禁期间被折磨而死。要对布哈林的贡献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就必须涉及一些重要的论题。在二十大以后，苏联历史学家联系苏联的一些新老问题，就并非偶然地提出这样一些论题：农业政策问题，农村地区积累的方法和代价等。但是对这样一些问题却没有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每一个党和每一个人都必须能够自由地正视他们自己的历史，而不应对之采取摩尼教的态度和贝壳投票的办法^①。正视斯大林时代以及苏共最高领导人所公开谴责的那些错误和缺陷，这是使苏联现社会再生的条件之一。至于对我们来说，重提“布哈林案件”，除了具有一般的历史重大意义之外，还在道义上、理论上、教育上和政治上有其连带的影响。

^① 摩尼教把善与恶绝对化，认为二者是组成人世的基础。贝壳投票为古代雅典人民会议决定国事犯流放国外的一种投票方式，只要写有犯人名字的贝壳超过六千枚，便把他逐出国外十年。——译者

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赞成合理地调查过去的事件，是我们反对各种各样偏执和教条主义的斗争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的许多悲剧和它的各种成就，都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指出了一条我们必须采取的道路。难道我们能够不从过去、不从国际工人运动中很好地吸取教训吗？当然不能那样。实际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即把它看成最先进、最正义的社会组织形式，认为由于它保证了和扩大了民主，由于它实际上使人免于剥削和压迫，因而自身能够得到巩固）正是通过历史的教训而日益成熟和清醒起来。反之，教条主义因其不可能批判地分析现状，不可能充分掌握行动的方式和要求，其结果常常是否认过去经验所提供的宝贵东西。

* * *

贝特朗·罗素和平基金会已经给一些意大利学者寄去了呼吁书，请他们支持布哈林的儿子尤里向苏联政府和共产党的要求，为一九三八年莫斯科大学受到审讯并判处死刑的他的父亲恢复名誉。在接受邀请的人中有保罗·斯普里亚诺、古伊利亚诺·普罗卡西和朱塞普·博伐等同志。

基金会的邀请中还附有一封布哈林的儿子致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的公开信。

斯普里亚诺、普罗卡西和博伐在这一呼吁书上签字时，重申了意大利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

附录三

答《共和国报》记者问

保罗·斯普里亚诺和阿尔多·托尔托雷拉说明意大利共产党的立场是：“如果今天我们为布哈林而斗争，那么明天我们就要为托洛茨基而斗争。”

“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摆脱了这些教条的束缚，就可能有利于朝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罗马讯：“我们并不是直到不久前才让人们了解布哈林的为人的。例如，朱塞普·博伐就已经把他的情况写得很清楚，把他说成是一系列布尔什维克事件的最杰出的参加者，在与斯大林的一定形式的斗争中曾起过主导作用。我本人在《意大利共产党史》第三卷中，也用了几章的篇幅谈及莫斯科审讯的诬陷。但是很清楚，《团结报》把一位共产党历史学家的文章刊登在比较突出的位置上，这就未必仅仅是出于保罗·斯普里亚诺一时的兴致。”

实际上，我们正是要听一听保罗·斯普里亚诺的意见。他在上星期五的共产党日报的第三版上，表明了他本人赞成为尼古拉·布哈林平反的立场。在发表那篇文章的同时，还

刊登了一条新闻说，一九三八年被斯大林枪决的那个布尔什维克要人的儿子尤里·拉林(他在其父被害两年前出世，而取这个假名，也是因为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不容许有人再姓布哈林)，通过诺丁汉的贝特朗·罗素和平基金会，转交给贝林格一封公开信，请求他带头敦促苏联共产党完成为他父亲恢复名誉所必需的法律程序。这些程序在前些时候已着手进行，但在官僚政治的迷宫中又消失不见，而成了卡夫卡《审讯》的翻版。这封公开信，连同一份由斯普里亚诺等人签名后寄回来的呼吁书(这份呼吁书说“我支持尤里·拉林·布哈林的请求，并要求苏联政府重新审理布哈林案件。”)不仅寄给了贝林格，而且还寄给了保罗·斯普里亚诺、古伊利亚诺·普罗卡西、朱塞普·博伐；据这位共产党历史学家说：“我想还寄给了莱利奥·巴索。”正如人们能够看到的那样，意大利共产党的反应并不是默不作声，而是要使这桩不仅具有历史和文化性，而且带有实际政治性的案件爆炸开来。在此以前，意大利共产党还从未采取同情斯大林审讯中那些“主要”受害人的立场。目前它将如何行动呢？在圣地亚哥·卡里略取消了“列宁主义”这个词的时候，意大利共产党这样做，也许就是一种信号，要对意共的思想根源开展一场大辩论(贝林格最近在巴塞罗那提到了这个问题)吧？对意大利共产党来说，除了从人道和道义以及严格的政治考虑出发，有必要为十月革命的这位领导人伸张正义之外，这是不是对自己那个“蜗步革命”的论题进行的重新思考和探索呢？

斯普里亚诺回答说：“这个问题不应该向我，而应该向党的领导人提出来。但是，依我看来，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一九

三七年那些被告的政治信念问题，因此有必要恢复所有受斯大林迫害者的名誉，包括托洛茨基在内。”

但是，在一定意义上说，陶里亚蒂是否也称布哈林派呢？

“关于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很多讨论。陶里亚蒂本人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他们是合作过的。一九二六年，就是布哈林最有势力的那一年，陶里亚蒂也在苏联。那时，他是斯大林反对左翼力量的同盟者。毫无疑问，布哈林关于‘循序渐进主义’、‘中间阶段’（其中他预见到各种非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民主革命），以及工农关系的一切想法，必定对陶里亚蒂产生了某种影响。人们也必须记住，陶里亚蒂是一九六四年去世的，而到一九六七年，人们已经可能想到，恢复名誉的过程正在进行着。”

斯普里亚诺解释说，实际上是斯塔索娃首先要求采取这一行动的，当时她已经近九十岁（斯塔索娃除了其他职务外，还担任过列宁的秘书和国际红色救援会主席）。她同其他一些老布尔什维克一起，在二十二大以后提出了这一要求。“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已不象一九五六年二十大期间那样，只限于争论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清洗’的秘密报告，而且这时，一些象米高扬那样的人物和赫鲁晓夫本人，已经在讲坛上大露头角了。斯大林去世以后，尤里·拉林和他的母亲从集中营里被释放出来。只是到了最近，他们才共同向赫鲁晓夫提出重新为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平反的请求。赫鲁晓夫似乎接受了这一请求，但是后来事情又突然停顿下来。不管怎么说，他毕竟于一九六四年被赶下了台……”

“历史”问题于是变成更加尖锐的政治问题了。我们问过

意大利共产党负责文化事务的阿尔多·托尔托雷拉。他马上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经验采取批判性分析的立场，并不是从我们关心布哈林案件时开始的。”

但是直到今天，你们两人不总是关心一些次要的人物，而不是那些大名鼎鼎的人士吗？

“或许人们总是不太了解，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在进行党所鼓励的历史研究中，相当长期以来就已经拒绝对大多数布尔什维克老战士判罪（它不仅是根据道义上的标准）的那些说法。

因此，我们并不是昨天才开始进行工作，来深入研究和彻底弄清象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这样的共产党重要人物的功过，并弄清对他们所加的罪名的。”

这项工作不再被认为是对苏联内政的“一种干涉”吗？

“这是必须谨慎从事的。有的人采取一种只图达到预定目标的讨论方法。这样，就可能好心犯错误，成为一种形式的干涉了。很显然，后来有很多人对旨在使马克思主义摆脱其教条主义外壳的争论一点也不感兴趣，其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对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都是根本敌视的。与之相反，我们和另外一些人的讨论，则是要使社会主义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和桎梏，以期有助于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事业。”

意大利共产党会成为布哈林派吗？

“驳斥历来对布哈林的为人及其作用的诽谤，并不意味着就自不待言地支持他所采取的立场。例如，葛兰西在其《狱中札记》中，就驳过（甚至使用了他不得不在这些札记中使用的

特别语言) 托洛茨基的某些看法, 斯大林控制下所发生的事情, 以及布哈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何况在‘两种文化’, 即互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的整个问题上, 列宁和布哈林本人之间也是有争论的, 虽然列宁认为布哈林是最聪明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

布哈林的立场比列宁更加教条, 而且在某方面比列宁更富于冒险性。葛兰西的分析, 实际上就是要清除布哈林例如在其《社会学指南》一书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教条主义。”

意大利共产党坚持这种明确的立场, 归根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动机?

“我认为, 我们必须继续沿着使我们党成为伟大的党的那条道路前进, 因为只有这条道路才能对待现实提出的许多新问题。走这条道路也就意味着力求严格地忠诚于我们自己的目标, 同时又有不断革新的能力。”

附录四

第一批签名的人

我请求苏联政府重新审理尼·伊·布哈林案件，为他恢复名誉，并公开说明当时造成他的冤案的情况。

澳大利亚：

埃里克·艾伦斯

乔·帕尔马达

梅维斯·罗伯逊

(均代表澳共全国执委会)

阿拉斯太尔·戴维森

特奥多尔·普拉格博士

比利时：

皮埃尔·儒瓦

马塞尔·利布曼教授

埃内斯特·曼德尔

奥地利：

冈瑟·安德斯博士

约瑟夫·凯普

哈拉德·伊恩伯格

利奥波德·格伦沃尔德

格奥尔格·洛维博士

莱·马什

爱德华·马茨博士

捷克斯洛伐克：

爱德华·戈尔德施图克尔教授

伊日·佩利坎

法国：

路易·阿尔蒂塞尔

艾蒂安·R·J·巴利巴尔

西蒙娜·德·博瓦尔
克洛德·布尔代
乔治·卡萨利斯博士
弗朗索瓦·夏博尼埃
让-皮埃尔·法耶
乔治·蒙塔隆
罗贝尔·蓬狄戎（法国社会
党国际书记）
阿尔贝·索博尔教授

德国：

恩斯特·T·伯特歇尔
英格博格·德雷维茨博士
D·H·戈尔维策教授
米夏埃尔·施韦林
汉纳斯·施文格尔博士
乌尔里齐·宗内曼教授
乌韦·韦塞尔教授

希腊：

帕纳伊奥蒂斯·卡内拉基斯
马诺利斯·格莱佐斯
伊利亚斯·伊里欧
斯塔西斯·帕纳古利斯
米希尔·拉普蒂斯

莱弗特里斯·阿波斯托卢
阿马利亚·弗莱明女士

荷兰：

洛莱·璩特教授

匈牙利：

安德拉斯·赫格杜斯教授
艾格尼丝·赫勒博士
伊凡·塞莱尼

意大利：

恩佐·恩里克斯·阿格诺莱
蒂参议员
莱里奥·巴索参议员
朱塞普·博伐
马塞莫·卡奇亚里
昂伯托·塞罗尼
里卡多·隆巴迪
古伊利亚诺·普罗卡西
保罗·斯普里亚诺

西班牙：

费尔南多·克劳丁

挪威：

约翰·加尔顿教授

葡萄牙：

奥特洛·萨赖瓦·德·卡瓦
略

英国：

迈克尔·巴勒特·布朗
霍华德·布伦顿
乔治·布里奇斯
诺尔曼·巴肯下院议员
斯图尔特·伯奇
肯·科茨
米克·科斯特洛（全国工业
组织家，共产党）
杰弗·埃奇下院议员
鲍勃·爱德华兹下院议员
克里斯·法利
马丁·费兰纳里下院议员
肯·弗利特
特雷弗·格里菲思
马克·哈里森
埃里克·赫弗尔下院议员
昆廷·霍尔（《新左派评论》）

斯图尔特·霍兰

马丁·雅克（《今日马克思主义》）

蒙蒂·约翰斯顿

托姆·利特里克下院议员

莫希·列文教授

琼·莱斯托下院议员

奥斯卡·卢恩斯坦因

史蒂文·卢克斯博士

马克斯·马登下院议员

琼·梅纳德下院议员

伊恩·米卡多下院议员

克里斯·马安特

斯坦·纽恩斯下院议员

丹尼斯·奥格登

汤姆·斯托帕德

托尼·托珀姆

奥德里·怀斯下院议员

美国：

诺姆·乔姆斯基教授
斯蒂芬·F·科恩
霍华德·法斯特
约瑟夫·汉森
伊丽莎白·哈德威克

伊尔文·豪威
科利斯·拉蒙特
保尔·斯威齐

南斯拉夫：
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教授
鲁迪·里兹曼博士

后 记

——若列斯·麦德维杰夫

罗素基金会为了促进前面提到的那场运动，把响应拉林呼吁的一份材料寄给了很多人。苏联著名的生物化学家若列斯·麦德维杰夫就是其中之一。七月十八日，正当这本小册子即将付印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他的下述来信：

贝朗特·罗素和平基金会，肯·科茨收
亲爱的肯：

感谢你寄来你手头所有的关于布哈林的材料。作为《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一书的作者之一*，在我们准备的材料中，我也有一些有趣的资料，涉及当时妨碍赫鲁晓夫为布哈林正式平反的情况。因为我们所写的那本书受到《执政时期》这个书名的限制，所以未能利用有关赫鲁晓夫下台后生活情况的一些有趣的材料。

在赫鲁晓夫辞职以后的头几年(1965—1966年)中，他一直处于抑郁状态，但是后来他又恢复了某些活动，去过莫斯科，一些客人还到他住的“乡间住宅”里听取他对很多往事的回忆。大约在一九六八年，赫鲁晓夫应邀去看一出叫做《布

* 这本书是和罗伊·麦德维杰夫合著的，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

尔什维克》的话剧，它在“现代人”剧场演出，导演和作者沙特罗夫是赫鲁晓夫早就认识的人。剧情描写的是一九一八年的事件，即谋杀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此事的反应。其中有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开会讨论这一事件的场面。赫鲁晓夫喜欢这出戏，演出结束后便会见了该剧作者兼导演沙特罗夫。在一次也有剧团的其他成员参加的讨论会上，赫鲁晓夫问沙特罗夫：“你再现了一九一八年党中央的那次会议——那是很逼真的。但是为什么既没有加米涅夫，也没有布哈林出场呢？我知道他们当时是在莫斯科，并且参加了那次会议的。”沙特罗夫回答说，要让无论是布哈林还是加米涅夫或者托洛茨基出场，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都还没有恢复名誉。于是赫鲁晓夫解释说，一九五八年，在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清除”出党的领导以后，曾经考虑给一批领导人恢复名誉，其中也包括布哈林和加米涅夫。

关于重新审查历次莫斯科公审的决议已经准备就绪，并且决定把它在报纸上发表。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并建议宣布平反。苏斯洛夫等人反对这一平反，但大多数人赞成。很可能是苏斯洛夫警告了一些欧洲共产党的领导人，因为欧洲各党中只有意大利党支持平反的全部程序，并且希望继续下去。然而，莫里斯·多列士却急忙飞往莫斯科，要求赫鲁晓夫延缓给布哈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等人平反。多列士说：“在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后，我们党几乎丧失了一半党员。假如你们要正式为历次公审中被宣判的人平反，^天 我们就会失掉其余的党员……你们可以晚些时候给他们平反，不要同时为所有的人平反，而是一个一个地慢

慢来。”赫鲁晓夫说：“这些争论影响了我们，而我现在感到遗憾的是，我听取了这一劝告。如果没有多列士的干预，我们将会替他们平反，而且必定已经这样做了。”

赫鲁晓夫的卫队长（他下台以后一直是受“保护”的）在正常情况下从不干扰赫鲁晓夫和别人的谈话。但是在这次会上，他要求赫鲁晓夫的妻子（她当时也在场）尽快把赫鲁晓夫带回家去。

除这次谈话之外，赫鲁晓夫还经常告诉他的来访者，说他非常懊悔在他执政时期没有及时替布哈林等人平反。

这一报道是根据参加那次谈话的人的证明写成的，同时也根据了赫鲁晓夫的其他访问者和他那个大家庭的成员们的叙述。

致最良好的祝愿！

若列斯·麦德维杰夫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七日

于伦敦国立医学研究所

介绍几种参考读物

对于那些希望更多地知道布哈林生平事迹的人来说，还必须阅读斯蒂芬·科恩所写的重要的传记《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怀尔德伍德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西德尼·海特曼出版了一本布哈林著作目录：《附有注释的书目》，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七年版。海特曼还在利奥波德·拉贝兹编的《修正主义》一书中发表了一篇短文，该书为艾伦和昂温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另一篇有参考价值的短文是亚历克斯·诺夫所写的《略评布哈林及其思想》，收入阿布拉姆斯基编辑的《纪念E·H·卡尔论文集》，麦克米伦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卡尔本人对布哈林的评价，可以从他为《共产主义ABC》一书收入“鹅鹑当代名著丛书”时所写的序言中看到。下列两书中也有相当有趣的论述：莫希·卢因：《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暗流》，普卢托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权力和苏联权贵》，安·阿博尔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

* * *

关于苏联的政治历史背景，最不可缺少的是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发言人”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

* * *

关于这次审讯的情况，除在前面章末注中列入的著作（主

要是卡特科夫的著作)以外,读一读阿瑟·科斯特勒的《正午的暮色》,以及安迪·麦克史密斯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这部关于大清洗的有趣的现代著述已经出版),都是有益的。杜威委员会编纂的两卷集仍然是很有帮助的。同样,列昂·托洛茨基本人论述布哈林审讯的著作,也是十分中肯的,可查阅《列昂·托洛茨基文集(1937—1938)》,“开拓者”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